



2020年9月21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

谨随函附上在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召开的关于“环境退化的人道主义影响与和平与安全”的视频会议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易卜拉欣·蒂奥先生和土地大使兼环境活动人士因娜·莫贾女士所作通报的副本，以及尼日尔外交、合作、非洲一体化和尼日尔侨民部长卡拉·安库劳先生阁下、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副总理兼外交、国际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长路易斯·斯特雷克爵士阁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联邦及南亚事务国务大臣温布尔登的塔里克·艾哈迈德勋爵阁下和比利时、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爱沙尼亚、法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南非、突尼斯、美利坚合众国和越南代表所作发言的副本。

根据安理会成员就本次视频会议达成的谅解，以下代表团和实体提交了书面发言，并随函附上副本：巴西、丹麦、埃塞俄比亚、欧洲联盟、危地马拉、印度、爱尔兰、日本、列支敦士登、马耳他、墨西哥、纳米比亚、建设和平委员会、葡萄牙、大韩民国、塞内加尔、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乌克兰。

根据2020年5月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常驻代表的信（S/2020/372）中所述、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商定的程序，随函所附发言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主席
阿卜杜·阿巴里（签名）



附件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我也感谢尼日尔政府组织今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

几十年来，关于人道主义挑战的讨论都围绕着武装冲突或灾难的后果。这两个问题都有具体而独特的指导人道主义行动的法律、程式和程序，彼此几乎没有交叉。

因此，安全理事会继续关注与冲突有关的人道主义挑战。它聚焦于安全问题以及减轻对包括平民、妇女、儿童和流离失所人群在内的弱势群体的影响；医院或学校等受保护场所；武器的供应和使用；交战各方遵守法律的必要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最直接遭受战争、暴力和破坏的社区越来越频繁地——也越来越迫切地——将气候冲击与贫困、不公正、排斥和武器供应并列为一个令人关切的关键问题。几十年来，环境方面的问题已被纳入红十字委员会的人道主义应对措施：例如，战争遗留爆炸物和土地污染；废物管理；确保安全饮用水。我们的行动对策为更深入地从政策上思考环境退化、气候风险、人道主义需求以及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铺平了道路。

受影响人群报告的其中一些关切是对未来灾害的恐惧，如荒漠化加剧或极端天气事件造成流离失所，而另一些人如今就生活在这些恐怖之中。生活在萨赫勒和乍得湖区域的族群是世界上最坚韧顽强的族群之一，但面对冲突、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累积压力，他们的生存命悬一线。

上周，我访问了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当地民众向我讲述了他们遭受不断加剧的暴力和流离失所的情况。是的，他们流离失所，首先是因为冲突和暴力以及违反法律和原则的行为。但他们也认识到，由于降雨模式变化以及农民和牧民土地的稀缺，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他们谈到传统的族群冲突解决机制受到侵蚀，以及武装团体和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操纵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这些族群正在遭受破坏性的洪水和干旱的冲击。由于过去一年来的冲突和暴力，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有100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导致他们极易遭受下一次冲击，如过去几周的致命洪水。

安全理事会和我们一线人道主义组织如何能够支持那些被赶出家园、在危险条件下生存的人，那些在漏水的避难所或寄宿家庭狭小房间里住了几个月或几年的人，那些现在被暴雨淹没的人？

长期以来，世界忽视了萨赫勒区域，致使大量人道主义需求得不到满足。然而，当地的气候变化和環境退化比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更为强烈。多年的冲突、不发达和犯罪导致了脆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巨大的人道主义需求。

红十字委员会看到这些模式在我们工作的许多冲突地区反复出现。显而易见，受冲突影响的人受气候冲击的影响也格外严重。这也包括那些生活在正规治理系统之外的人。红十字委员会估计，当前全世界约有6 600万人生活在非国家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这令处理复杂问题的妥善治理努力鞭长莫及。

安全理事会成员——所有国家以及法律专家和发展、气候和人道主义行为体——采取紧急行动至关重要。但是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

我要分享我从走访红十字委员会行动过程中带回的一条主要信息。受影响的民众不想要施舍，即使他们可能暂时需要。不管原因是冲突还是灾难，或两者兼而有之，人们都需要一个独立的未来，一个可以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养活家人的未来。考虑到这一点，红十字委员会今天的重点有两个。

第一，我要谈谈采取可减轻冲突影响、保护族群免受伤害的人道主义行动的问题。我们致力于帮助建设强大和强韧的社区，能够抵御环境退化和连续的气候冲击。我们在系统、族群和个人层面开展工作：从建造保护族群免遭洪灾的墙体，到支持新的微型经济企业并引入废物管理系统和做法，再到为牲畜接种疫苗和分发抗旱作物种子。

红十字委员会的第二个重点领域是遵守国际人道法。鉴于气候危机和战争造成的大规模环境退化，红十字委员会正在加快与各国的联系，并将于下周发布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最新准则。该准则将协助各国和其他各方解释和适用国际人道法，并将其规则纳入军事手册以及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以加强保护环境。

从萨赫勒和乍得湖区域到全球各地的战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正处于环境退化、气候变化和冲突的前线。着眼于遏制冲突和暴力的军事和安全措施不会建立和平与安全。

我们必须确保把高风险人群作为我们紧急的优先事项。在建设具有复原力的社区的同时，努力保护这些群体免遭暴力至关重要。有力度的行动需要具备良好的架构，并在执行时严格遵守各项法律和原则，以避免助长更多的暴力循环。

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大体上赞同和平、安全与我们的气候及环境的关联，但是我们如何应对则仍需要更多的批判式分析与分享经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欢迎定期系统地讨论今天的这个问题。这将使我们得以互相学习，设计因地制宜的创新对策，关键的是，确保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更大影响。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为今天的讨论带来人道主义视角。

附件2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易卜拉欣-提亚乌的发言

请允许我感谢安理会主席国尼日尔在安全理事会讨论一个如此关键的问题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退化的人道主义影响与和平与安全”时向我发出邀请。

当今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已从国家间的冲突转为非国家行为体造成的暴力。对这些冲突根源的评估表明，很大一部分与环境有关。这种关联或是由于石油、矿物或者野生生物等自然资源丰富，或是由于土地、水源或者植被的稀缺。

在干旱的土地如非洲的萨赫勒地区，暴力的爆发常常是因为争抢贫瘠的土地和稀缺的水资源。以下三种因素的结合使局势雪上加霜。

第一个因素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以满足农民、牧民以及渔民的基本需求。城市居民可能有额外的收入，但是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地区产生的收入。第二，由于土地退化、干旱以及气候变化，资源正在缩减。以及第三，人口稳步增加，给自然资源增添了额外的压力。

这些人口基本上依赖正速度惊人地被耗尽的资源，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需求使局势变得无法长期预测，这种情况因为治理薄弱、机构无力以及应对紧急状况的能力有限而加剧。

尽管国际社会做出英勇努力，生命正在得到挽救，但却无法改变。恶性循环一年更比一年严重。我们必须刨根问底，处理问题的根源。

因争抢自然资源而引发冲突并非新闻，但是其强度和频率却前所未有的。农民和牧民为控制稀缺的肥沃土地和水源而发生争斗。由于自然资源的使用者来自不同的部族或宗教团体，而有力的司法体系缺失，于是出现过度使用暴力、导致危险的报复循环往复的情况。

干旱的影响更加频繁，也更加严重。干旱始终是对生命和生计的严重威胁。该现象本已影响所有气候带，现在约有70个国家定期受其影响。仅过去三年中，就有超过25个国家由于干旱而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干旱意味着缺水、停电、健康状况退步以及经济势头停滞。每年因干旱而损失的农产品足以全年每天供给8 100万民众，这相当于德国的人口。

旱灾可导致脆弱社区的动乱风险增加一倍。粮食价格攀升，国内动乱爆发，主要的动因是生活在大城市郊区的弱势民众。对许多经济基本依赖初级产业的国家来说，常年的干旱总体上对应多年的经济下滑。

我认为，我们在处理环境与安全之间的关联时，要思考四个层面：第一，生态系统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从根本上为人类福祉与人的安全奠定了基础；第二，无论什么渊源的冲突均影响环保投入的可行性或可持续性，也影响其结果；第三，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竞争以及收益分配不平等增加脆弱性和冲突的风险；以及第四，环境合作可提高处理冲突、预防以及恢复的能力。

安全与不安全的范畴绝不仅限于是否存在暴力冲突，而是包括可持续生计的来源、健康以及福祉。不同类型的暴力与干旱和沙漠化导致城乡迁徙增多有关。例如，当干旱及由此引发的向外迁徙导致农业减产时，对一国政府的不满可能增加。

在其它情况下, 穷苦移民的经济希望落空, 加上街头青年团伙泛滥, 致使青年堕入暴力螺旋。青年陷入绝望, 看不到充分的前景, 可能成为恐怖团体和各种贩运者容易获取的猎物。国家收入、特别是采矿业收入分享不均所致的挫折与不满引发严重不满, 有时是叛乱。

世界人口绝大多数依赖植根于土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土地的健康直接和间接影响经济、赋予权能的程度以及人权, 因此, 土地的健康推动了环境退化对和平、安全以及稳定的影响。

我们评估和处理环境退化与气候变化所致安全风险的能力没有跟上风险格局变化的速度。

所以, 我们如何防止环境退化, 促进和平与安全? 我们必须明白, 动员社会防止某种惨痛后果不到为时太晚可能感受不到的威胁何其困难。

环境安全是之所以要投入于全球环境裨益的根本, 对于维护地球维持生命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这些生态系统生成水、食物以及清洁的空气。减少环境安全风险从根本上还取决于改进资源的治理, 提高社会抵御自然资源冲击和压力的复原力。

的确, 人类与土地之间核心、根本关联的积极层面是一个可双向晃动的钟摆。为此, 保护土地可牵动和平、稳定与生态系统恢复的广泛循环, 这是一个建设性的反馈轮回, 远远超出最初保护环境的选择。

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会议上, 我们大多数旗舰方案把处理环境退化作为一种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手段, 例如“非洲可持续性、稳定与安全倡议”就旨在处理与土地退化和沙漠化有关的安全挑战, 其目的是支持非洲国家在土地恢复方面创造体面的绿色就业。另一个目标类似的重要倡议是“绿色长城”倡议。我确信, Inna Modja将更多谈论该倡议的愿景。

这些只是行动的例子, 但是处理气候和环境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必须从整个影响链着手, 做法是缓解气候变化, 强调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调整经济社会系统, 更好地处理由此带来的资源竞争的加剧, 并且加强管理冲突的机构。

要防止冲突, 同时保护我们的星球, 我们就应处理环境退化问题。我们的环境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福祉。如果我们协调一致地避免、减少以及逆转土地的退化, 我们就能更好地预见、防止以及处理世界上的许多冲突。

附件3

土地大使兼环境活动人士伊娜·莫加的发言

我很荣幸就维护和平与安全问题在安理会发言。

我是一个萨赫勒女孩，在马里和加纳出生长大。我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对这个极其脆弱的地区充满了爱。

我在沿着绿色长城从萨赫勒西部到东部的旅程中，看到了住在那里的农村社区。我意识到，迫切需要找到办法来解决荒漠化和气候变化的后果及其对安全与和平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记得青年们说的一句令人心酸的话——“到巴塞罗那去，至死方休”。被迫移民和对欧洲黄金国的梦想夺走了我们的许多青年。我的愿望是为这些青年——他们占萨赫勒人口的50%以上——提供机会和一个看得见的未来，从而恢复非洲人对非洲大陆的梦想。特别是，如果我们给予青年和妇女必要的支持，他们可以成为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作用非常重要。

我在途中还遇到了家人在尼日利亚北部被“博科圣地”组织杀害的儿童和青年，该地区因粮食资源匮乏等原因而被削弱。我非常希望绿色长城等项目帮助解决该地区的多重问题，如萨赫勒地区的被迫移民、不稳定和冲突。

附件4

尼日尔外交、合作、非洲一体化和尼日尔侨民事务部长卡拉·安库劳的发言

[原件:英文和法文]

首先,我谨缅怀尼日尔、萨赫勒、东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最近洪灾的受害者。

在我们审视气候变化的影响时,这些已预见的灾害——它们并非首次发出这些警示——再次提醒我们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的严重性,它危及我们的生活方式,破坏迄今为止确保人类与环境保持一定和谐的生态稳定。

我要强调,世界所有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然而,在非洲大陆,这一现象最为严重,应对措施最为薄弱。这种情况可以用各种制约因素来解释,包括适应方面的挑战、荒漠化、水资源和可耕地稀缺,以及水位下降或消失。这些都给全世界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往往发生在极其不稳定的局势中。

萨赫勒地区和乍得湖流域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些地区非常脆弱,人口呈指数级增长。事实上,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些地区的气候极其多变,这反映为降雨模式变化、出现极端天气事件和一再发生干旱——过去十年发生了三次干旱,对农业用地、牧场和水资源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例如,尼日尔每年损失10万公顷土地。这些气候冲击频繁发生,大大降低了民众的抵御能力。

正如尼日尔共和国总统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萨赫勒地区气候委员会主席穆罕默杜·伊素福先生阁下所指出的那样,萨赫勒地区的局势表明,气候破坏和环境退化对粮食和营养安全构成深远影响。和冲突一样,这确实是近年来饥荒增多的原因之一。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口的生计依赖农业的地区,如果处理不当,到2050年气温上升2摄氏度,可导致粮食减产15%至25%,而尼日尔的人口每18年翻一番。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气候冲击之外,萨赫勒地区也正在受到安全冲击,这带来毁灭性的悲惨后果。萨赫勒地带和乍得湖流域暴力升级,导致整个地区的流离失所者增加。目前,萨赫勒地区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冲突地区,450万人不是境内流离失所者就是难民。这几乎是2012年的三倍。

在这种双重冲击的背景下,正如实地机构恰当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和冲突动态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其中气候变化的影响造成额外压力,而冲突则削弱社区的应对能力。此外,在人口因恐怖袭击和不安全而减少的地区,不可能实施环境恢复项目,从而导致环境进一步退化。

气候、安全与发展的关联是无可争议的。要有效处理这一问题,需要更适应这些新挑战的合作政策,这些挑战不放过任何一个国家,对各国和平与稳定以及子孙后代的命运构成真正的威胁。

因此,要将气候变化纳入考虑,需要采取更加全球性和协调一致的办法,因为只有共同努力,我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要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安全风险,需要改变行为方式,以开放的心态不断追求和谐平衡,最终使人类与环境和解。

我们安全理事会的目标不仅仅是解决冲突；我们也有着预防冲突的根本责任。因此，理解气候变化的原因、影响和复杂性，特别是在冲突地区，在这方面至关重要。

国际社会必须确保国际人道法，以便能够没有政治顾虑地向千百万妇女儿童提供援助，冲突、冠状病毒病疫情和气候变化这三重影响使他们处境脆弱，特别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也门和利比亚。

应对环境退化对和平与安全的人道主义影响是一场多层面的斗争，综合土地保护和恢复以及自然资源的审慎管理。总之，我们必须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通过满足人民的需求，也保护他们免受恐怖团体宣传的影响。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贫困和动荡是滋生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温床。

我谨向安理会保证，我国承诺支持采取任何区域或国际举措，有力应对环境退化及其影响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问题。同样，我谨向安理会保证，我国准备好改善与各国、国际组织和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附件5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副总理兼外交、国际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长
路易斯·斯特雷克的发言**

首先，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赞扬主席先生你召集这一重要讨论，我们感谢通报人所作的具有针对性、令人警醒的发言。

气候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危害给人类造成的深重苦难要求拿出坚定的政治意愿和采取果断的集体行动，才能紧急、全面地应对这一危机。干旱、荒漠化、洪水、海岸和河流侵蚀等环境危害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粮食和卫生服务严重缺乏保障、社会契约破裂以及争夺日益稀缺的资源所引发的痛苦的暴力循环，致使数百万人受苦受难。全世界约有25亿人依靠农业谋生，环境退化的次生影响，例如土地肥力降低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有可能造成更多苦难。

在萨赫勒地区、乍得湖流域以及包括海地和阿富汗在内的许多国家，环境恶化对入道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造成重大影响。不平等现象加剧，发展受到损害，稀缺的财政资源被转用于适应和减缓工作，受影响人口的机会成本很高。此外，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等风险乘数增加，加剧了本已艰难的局面。与此同时，族群间紧张局势加剧，政治两极化现象加剧，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减弱，从而削弱了治理能力。

要有效应对这些多层面挑战，我们就需要采取统筹一致的做法，在联合国所有机关和专门机构的职权范围内利用其技术能力。关于生物多样性、荒漠化、土地退化和气候变化的三项国际公约是一个有机综合的整体，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重申对它们的坚定支持。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两者都会给和平与安全造成严峻后果。因此，我们重申，对于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所有人道主义和安全关切，均须纳入按照规定应就安全理事会议程局势提交的所有报告。

此外，我们呼吁采取能力建设举措，改进土地保有权制度并加强环境治理，从而在环境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建设抵御能力。发达国家起码还必须履行对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工作的认捐承诺。此外，我们重申，所有国家必须遵守《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条款，并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将气温升幅保持在比工业化前水平不高出1.5°C的水平。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全球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就会继续。

我们还重申对于FSO SAFER油轮的担忧，这是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将加剧也门人民的人道主义苦难。

油轮爆炸可能会导致有人丧生，石油泄漏会破坏海洋环境和赖以生存的生计。因此，需要就此问题采取紧急行动。

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活动必须秉持整体和长期方针，才能取得成效。因此，我们国际社会必须下大力气，在和平、安全、发展、人道主义各项工作中纳入对于环境问题具有敏感认识的战略。这是更好地保护最易遭受环境退化影响的人、保护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物物理环境的最妥善办法。

附件6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负责南亚和英联邦事务的国务大臣兼防止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首相特别代表、温布尔登的塔里克·艾哈迈德勋爵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把环境挑战与安全挑战相互联系的问题保留在安理会议程上，也感谢你阐明气候变化如何在削弱萨赫勒地区和乍得湖流域人的安全。

我还要感谢我们的专家通报人——彼得·毛雷尔、易卜拉欣·蒂奥和因娜·莫贾——发表宝贵见解。很高兴再次见到毛雷尔先生。需要继续将专家的见解带到安全理事会辩论会上。我们要指出，大约13年前，联合王国就气候安全的重要性问题首次召开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见S / PV.5663）。事实上，这是我过去三个月第二次参加安全理事会辩论会，这突出表明了我们对这一重要议程项目的共同重视。

就在我们争取明年于格拉斯哥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COP26），并努力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的承诺化为具体的、可落实的行动之时，乍得和尼日尔有20万人遭受洪灾之害。这告诉我们现在就应该行动，而不是等到明天。

气候变化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甚至助长了冲突根源。今年，整个萨赫勒地区有20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这再次提醒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

2015年发布的最新《联合王国国家安全战略及战略防御与安全评估》将气候变化确定为我国安全面临的全球最大全球性长期挑战之一。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度《全球风险报告》所列的全球前五项风险都是环境风险，这是该报告历史上第一次。萨赫勒气温升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倍半，因而深知这种威胁的紧迫性。警告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而且来自越来越远的地方。现在应该采取行动了。

就联合王国而言，我们努力以身作则。过去六年中，我们在萨赫勒地区向世界银行萨赫勒地区社会保障应变计划提供了6400万美元，以帮助该地区各国政府改进天气数据和因应气候冲击。同期，我们在该地区斥资1.79亿美元开展试点项目，以建设抵御能力和制定因应措施。英国已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提供总额超过140亿美元的国际气候融资。这笔资金很大一部分将用于增强抵御能力。我们只能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克服这个问题，这样说属于老生常谈，但却是少有的正确。

挑战是艰巨的，正因为此，我们才致力于利用担任COP26共同主席的机会，推动加大气候融资，改进预警系统，提高各国应对风险的能力，以及加强包容各方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对于妇女和各国社会最弱势人群的保障。

气候变化与冲突态势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当然，我们必须应对属于冲突根源的治理挑战。但是，安全理事会若要在处于抗击气候变化第一线的地区支持和平与安全，我们也就必须使气候风险评估和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成为安理会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经常将气候风险纳入联合国预防和解决冲突战略以及建设和平计划。我们需要加强联合国系统分析和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将此作为一种

基本的工作方式。我们从共同努力中知道，不安全感对于最边缘化群体和处境最不利的群体的打击最大。

气候驱动的不安全状况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女童和妇女不幸地往往更容易因灾害而陷入贫困，甚至遭到剥削。我们在应对气候所致安全问题时，绝对必须满足妇女和女童的需要和优先事项，并利用她们在其社区中的关键位置上领导我们集体应对行动的潜力。

主席先生，我要在发言的最后再次感谢你召开今天的重要辩论会，同时指出，萨赫勒和乍得湖盆地地区为我们大家提供了确凿而又令人痛心的证据。这些证据证明，与气候有关的安全威胁是真切的。它们是实实在在的。它们迫在眉睫，不容商量，我们必须以集体和全面的方式加以应对。安全理事会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做的最佳工具。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附件7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菲利普·克里德尔卡的发言

我谨感谢尼日尔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组织本次辩论会，并感谢各位通报人所作通报。

尼日尔境内正在发生的大规模洪灾清楚地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剧烈地影响着萨赫勒。现在，洪水在该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冠状病毒病。

有些人可能认为，安全理事会并非举行气候变化会议的最佳论坛，但比利时认为，我们开会讨论气候变化对冲突和人道主义需求的影响是恰当的。乍得湖地区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一个可怕但令人信服的例子。在那里，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的相互作用正在破坏可持续发展，造成长期人道主义灾难，并滋生因治理不力而乘虚而入的极端主义运动。对当地民众来说，气候与冲突之间的联系今天已成为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

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造成最严重影响的地方，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并不总是最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这种脆弱性主要取决于社区适应和预防气候风险的能力。在这种能力较低的地方，如脆弱局势中，民众最容易受到伤害。因此，比利时呼吁更深入地分析环境与冲突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来的人道主义挑战，并思考人道主义等方面的应急措施如何能够加强抵御能力。我们希望，定于9月25日与尼日尔、欧洲联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举办的虚拟部长级会议能够开始思考这些相互重叠的脆弱性。

请允许我在9月25日会议之前与安理会分享我们的一些看法。

第一，许多冲突中和冲突后国家得到的气候资金很少，而它们可能是最需要这种资金的国家。此外，总体而言，对脆弱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对极其脆弱国家的一半援助是人道主义性质的。因此，它起到了灭火器的作用，但无助于预防冲突。使援助符合脆弱环境多层次长期需求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而气候变化是此类环境的一部分。

为应对这一挑战，比利时启动了一个为期四年的人道主义项目，以期增强乍得湖地区青年的韧性。该方案由国际计划和我们在乐施会的伙伴执行。经验告诉我们，脆弱环境中的援助工作需要具有适应性、灵活性和创新性，而且在开展时必须密切结合地方当局和学术界对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具体局势的认识。毕竟，在没有湖泊可供捕鱼或因安全措施而无法进入湖泊的情况下，教青年男女如何捕鱼并没有真正的助益。

第二，安全理事会需要采取行动。在我国目前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将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纳入安理会相关任务的主流一直是比利时的优先事项之一。我们对迄今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并承诺，每当有任务期限需要延长时，我们都将继续推动这一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全局。应将气候和安全视角纳入整个冲突周期，从预防举措到调解战略，再到建设和平计划和和平谈判。这包括就共享自然资源问题进行谈判，预测未来气候风险，并提高当地民众的抵御能力。要使这一切取得成功，就必须提供气候风险评估，包括向安全理事会提供此类评估，并将其纳入更广泛的冲突和脆弱性评估。我必须强调气候安全机制和整个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用。

最后, 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在冲突期间经常遭到袭击, 导致相关社区生计被毁, 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请允许我指出, 国际人道主义法确实涉及保护自然环境。

附件8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的发言

欢迎阁下主持此次会议，感谢莫雷尔主席、蒂奥执行秘书和莫嘉女士的通报。

地球是全人类的唯一家园，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合力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关系到各国人民福祉，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根据联合国的最新报告，气候变化并未因新冠肺炎疫情止步，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在继续上升，实现全球温控目标并非易事。

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气候变化及相关的环境恶化危及民众生计，加剧资源紧缺，甚至成为激化武装冲突的原因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20个国家里，有12个饱受武装冲突之苦。在非洲和中东，动荡局势和环境危机叠加带来严重人道后果，无数民众因灾荒、战乱而流离失所。

面对气候变化等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心，综合施策，协同行动。

加强冲突预防，推动和平解决争端。环境问题同和平与安全没有直接联系。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但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表现不尽相同。国际社会应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客观分析引发冲突的根源，实事求是地评估环境问题带来的安全后果，有针对性地谋划解决和预防冲突之策，关键要有协调解决利益冲突的政策和机制。面对环境、资源因素加剧冲突的风险，国际社会更要有紧迫感，推动包容性的政治解决进程。安理会应履行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推动冲突当事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以尽快恢复和平与重建。

加大发展投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推进可持续发展来解决。国际社会应以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为契机，坚持发展优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核心位置，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缓解环境恶化的人道影响，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第三，我们必须履行国际义务，恪守气候变化多边承诺。如果气候变化加剧安全风险，那么落实《巴黎协定》等国际共识不仅涉及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也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各国特别是某主要大国应摒弃以自我为中心和本国优先，立即回到多边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切实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发达国家应兑现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并提出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能力。

第四，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非洲，助力非洲实现和平与安全。非洲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非洲事务涉及安理会三分之二的议题。消弭非洲枪声是非洲人民的共同期盼，更应成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国际社会要让非洲国家发挥解决自身问题的主观能动性。要努力加强非洲国家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

问题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面临特殊困难，国际社会应通过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它们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提前两年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我们还在研究本世纪中叶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愿景，愿尽己所能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积极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帮助沿线国家建设可再生能源项目，加快能源转型，实现绿色发展。

中国大力推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近年来累计安排10多亿元资金，通过合作建设低碳示范区、开展减缓和适应项目、举办能力建设培训班等方式，为非洲国家、小岛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

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弘扬多边主义，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附件9

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们感谢尼日尔召开今天的重要会议，并感谢各位通报人的通报。

今天，我们在关于气候和安全的讨论中体现了人性的一面。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安全理事会大多数成员努力将其保留在议程上，并探索这个被秘书长称为对人类最大威胁的问题的不同层面。

多米尼加共和国认识到，安全理事会面临的挑战是审议一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非常规威胁。然而，鉴于环境持续恶化，新的自然灾害显然变得更加频繁、严重和猛烈，成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永久的劲敌。

在处于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区域的20个国家中，60%目前处在脆弱和暴力状态。在许多情况下，气候冲击可能导致发展倒退和基本服务的系统性崩溃，并削弱人道主义人员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或有效预判这类需求的能力。

我们与千百万每天都在务农、放牧或捕鱼的人们和家庭团结一致，他们不得不生活在焦虑中，因为其收入受损，生计受到冲突、洪水、干旱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威胁，导致他们流离失所或以其他消极方式来应对。

冲突本身常常损害环境和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民用基础设施。这些都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冲突各方不要采取这些行动。此外，在冲突时期，旨在克服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的适应努力的优先级低于努力确保人们的安全。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是主要的安全风险因素，这些气候风险与武装冲突相结合，不仅使受影响国家和区域的情况恶化，还使联合国更难努力回应和有效支持这些国家和区域，因此安理会的一个优先事项是与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努力，以全面、相辅相成的方式有效应对气候危机的所有方面。同样关键的是，在应对这些后果时，要同时考虑到其他问题的存在，例如与性别、青年、儿童和老年人、特别是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有关的问题。

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全球健康危机。因此，除了在评估风险因素方面的成就之外，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还创造了新的意外情况，在评估那些能使我们在面临非常规威胁情况下预防冲突的可行机制时，需要加以考虑。多米尼加共和国重申致力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一步进展，以便我们能够共同实现以人为本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全面愿景和行动计划。

我们强调，迫切需要团结一致，以便安全理事会在其工作中应对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利影响。这样一来，就会从各个角度——人道主义、安全和建设复原力——考虑应对武装冲突的办法，以便采取行动处理当前的复杂情况，应对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挑战。

附件10

爱沙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斯文·于尔根松的发言

我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易卜拉欣·提亚乌先生和土地大使因娜·莫贾女士所作的内容丰富而深刻的通报。

十三年前,即2007年(见S/PV.5663),在联合王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首次讨论了气候变化与和平与安全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如今,这一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为了改善非洲包括乍得湖流域人民的生计,必须更有效地处理这一联系。

许多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没有能力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有一些工具可用,关键是使用它们。

为了认识气候变化在武装冲突中造成的后果,例如在萨赫勒地区,数据是一个基本先决条件。我们需要可靠和准确的信息。因此,必须改进数据收集工作及其质量,除其他外,找到创新解决办法来分析气候变化在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中加剧影响的作用。这将使我们能够进行更好的风险评估和更好的风险管理。此外,这将有助于采取系统方法,把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纳入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之中,这一方法是目前所急需的,也是如果安全理事会收到秘书长关于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的系统性报告就可以实现的想法。

显然,气候变化对包括萨赫勒地区在内的世界许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真正的当前威胁。依赖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等经济活动的人口极易遭受这种风险,并受到粮食不安全的影响。气候变化带来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竞争。因此,必须制订深思熟虑的资源管理政策,并且投入资源以建设受影响最严重地区的复原力。

然而,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问题,还是一个跨界现象,后者在边界存在漏洞和国家权力不足的地区日益恶化。因此,这个问题需要适当的多边协调和坚定的人道主义应急措施,包括更好地执行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对乍得湖流域地区构成的安全威胁,我们需要全面的国家、区域和国际合作,并且加强联合国及其机构和特派团内部的协调和一体化。

最后,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寻找妥善的解决办法。这不是速效解决办法,但却是唯一的出路。

附件11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古拉·德里维埃的发言

[原件：英文和法文]

部长先生，我谨欢迎你出席会议，并赞扬主席国尼日尔组织本次辩论会，这是在7月份由德国倡议和4月份由法国倡议举行的会议(见S/2020/751和S/2020/340)之后举行的。这表明把环境层面纳入冲突预防和危机解决。这在安全理事会已经成为现实。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和因娜·莫贾作了坚定的发言。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后果十分严重。它们导致人口流离失所，粮食和健康不安全水平上升，以及营养、经济、人口和社会失衡。遗憾的是，萨赫勒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那里的民众不可否认已经理解了这一点。因此，法国开发署通过“绿色长城”等区域项目，支持几个站在防治荒漠化前沿的萨赫勒非政府组织。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与该地区的挑战相符。

为了支持当然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民众和当局，我们需要预防性外交，这种外交可以解决所有不稳定因素，包括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崩溃有关的因素。这将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我们需要预测环境灾难的人道主义后果。我们不是从零开始。过去十年来，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建立了伙伴关系，建设在预防冲突以及土地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能力。这项工作必须更加系统化。

我们必须更进一步，为自己配备分析工具。大约2500起冲突与化石燃料、水、粮食和土地有关，造成了可怕的人道主义后果，在未来将更加破坏稳定。未免措手不及，并且帮助安全理事会能够及时作出反应，法国希望秘书长能够每两年对气候变化在世界各个地区和不同时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进行评估。

此外，必须评估脆弱的人道主义局势中的环境破坏风险。这将是我要谈的第二点。

也门“FSO SAFER”号油轮事件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油轮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以及本已受到冲突和环境灾难影响的红海沿岸国家数百万人的健康和生计构成巨大风险。也门的情况尤其如此。当务之急是让联合国小组能够进入该艘油轮。

最后，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在自然灾害后或维持和平行动期间开展人道主义救济行动时，必须系统地把气候和环境问题纳入干预规划。把气候和环境难民纳入考虑是一个全球性挑战，需要在所有行为体之间，特别是在实地，进行大量的协调努力。

附件12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钱宁的发言

首先,印度尼西亚感谢主席召开今天的会议。我欢迎尼日尔外交、合作、非洲一体化和尼日尔侨民事务部长卡拉·安库劳先生阁下出席本次会议。我也欢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副总理兼外交、国际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长路易斯·斯特雷克爵士阁下以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联邦及南亚事务国务大臣塔里克·艾哈迈德勋爵阁下。

我也感谢各位通报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易卜拉欣·蒂奥先生和《荒漠化公约》土地大使因娜·莫贾女士。

在全球各地,我们越来越多地目睹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殃及人民及其生计。这些影响已成为一个恶化因素,不仅会延长冲突,而且有可能逆转经济增长和发展。在此背景下,我想概述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需要加强伙伴关系、合作和信息共享。环境退化及其造成的安全影响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任何一个行为体都不可能单独予以解决。联合国及其伙伴之间的真正伙伴关系对于了解冲突根源和环境退化在这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这是找到合适和恰当解决办法的第一步。在乍得湖盆地和萨赫勒地区等既存在气候风险、安全局势又脆弱的地方,必须确定优先事项,因为在那里,过去长达十年的武装冲突造成今天有近1000万人依赖人道主义援助。冠状病毒病疫情增加了脆弱性。我愿附和彼得·毛雷尔先生所说的一句话:“在努力保护社区免遭暴力危害的同时,建设这些社区的复原力至关重要”(附件1)。实际上,根据此类社区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帮助它们建设适应能力和增强复原力极为重要。

第二,在整个和平进程中,必须把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作为主要问题来对待。为此,我们需要联合国系统内部有强大的协同增效作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仍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论坛。我们期望各国坚持《巴黎协定》,包括其所载的财政承诺,并落实国家自主贡献。

同时,目前正在讨论的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不应回避考虑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通过这种协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综合性的应对策略。

第三,区域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对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在率先采取举措应对该区域的安全挑战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西非和萨赫勒各国在这方面所发挥的带头作用表示了肯定。西非和萨赫勒各国今年将举行选举,政治局势更经常地会变得更加脆弱。今年是“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倡议的目标年,西非经共体和非洲联盟面临着加快步伐的巨大压力。他们需要强有力的集体支持。以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是一个重要理念,在国际上应得到支持。我们同区域利益攸关方一道,继续鼓励全球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我国外交部长在2019年1月一次类似的辩论会上所说的话:

“气候变化是真实的,目前正在发生……印度尼西亚随时准备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作出贡献。”(S/PV.8451,第10页至第11页)

附件13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德米特里·丘马科夫的发言

不可否认,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退化正在严重加剧社会经济挑战。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特别易受气候方面挑战的影响,这是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很好的例子。我们完全理解尼日尔同事召开本次会议的动机。据路透社报道,单是在尼日尔,撒哈拉沙漠就以每年48公里的速度持续扩大,造成土地进一步退化,并摧毁迅速增长的人口本已稀缺的生计。就连该沙漠中的蓝人,即图阿雷格人,也因缺乏牧区和水源而不得不作出调整和进一步向南迁移。我们赞同主席表达的关切,同样认为国际社会需要以适当方式优先处理相关问题。

然而,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是一个就环境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的平台再次明确表示怀疑。在这方面,我们谨重申以下观点。

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与冲突没有任何自动的联系。也没有任何已有定论、被普遍认可和被科学证实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对武装冲突有影响。

个别国家和次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可能因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环境退化的其他表现而恶化。然而,安全和稳定往往受到更直接的原因影响,并非所有安理会成员都倾向于谈论这些原因。这包括外部势力干涉会员国内部事务,滥用乃至制造冲突局势,企图不经有关国家政府同意就去开采自然资源。这不仅违反国际法,而且造成诸多环境灾难。在这方面,非洲和中东有许多例子。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指出,美国代表在列举例子时,忘记了占领叙利亚油田的例子。我们要强调这一占领,以及野蛮的石油生产方法,因为在叙利亚东北部,这些行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生态灾难。

另一种干涉是形形色色的经济和政治施压。这包括在未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胁迫性措施。这种行动特别损害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环境保护的能力,并阻碍它们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努力的能力。因此,单纯地考虑环境问题可能会失于片面而忽视了大局。

协助发展中国家——不论它们是处于一般局势中还是处于冲突后局势中——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保护环境,是联合国发展系统和驻地协调员的任务,他们依靠的是政府间任务授权和相关科学发现。捐助国不应回避自己的援助承诺。为尽量减少环境影响,必须帮助各国加强复原力。

至于国际人道法,主席在为今天的讨论编写的概念说明(S/2020/882,附件)中提到了国际人道法,同样众所周知,国际人道法禁止使用意图或可能预计会给自然环境造成损害的作战方法。然而,这一禁止并不能阻止武装冲突给自然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不论对这一重要规则的遵守程度如何。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应集中精力履行根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核心职能。这一职能如果得到履行,对保护环境肯定会有助益。

附件14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杰里·马特基拉的发言

首先, 请允许我祝贺尼日尔担任9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召开本次会议来彰显环境退化可能给和平与安全局势造成的影响。部长先生, 我们很高兴看到你在我们处理这一重要问题时主持安全理事会的会议。

我们还感谢《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易卜拉欣·蒂奥先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和土地大使兼环境活动人士因娜·莫贾女士所作的通报。我们还向今天与会的各位部长致意。

当然有必要更好地理解有效的环境治理和政策的影响, 以及这是否会发挥减少冲突的影响力和帮助实现和平与安全。

南非认识到, 气候变化是对人类和所有其他物种的生存威胁。事实上, 所有形式的环境退化都需要我们予以紧急关注, 需要所有会员国采取渐进、目标远大的集体多边对策。关于气候行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3以及其他16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全人类有效追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本原则——即减贫——仍然至关重要, 具体做法是不让任何一个人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掉队, 并首先帮助落在最后的人。

我们还认识到, 干旱、缺水、粮食不安全和荒漠化等被认为是由气候变化造成或加剧的因素增加了暴力冲突的风险。在非洲, 有证据表明萨赫勒、乍得湖流域以及非洲之角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些地方, 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候压力是威胁或风险乘数, 通过对水和牧场等稀缺资源施加额外压力, 加剧紧张局势和冲突。

正如我们今天从各位通报人和部长们那里听说, 萨赫勒、乍得湖区域和世界其他地方气候急剧恶化的影响、荒漠化、洪水、沙漠风暴和蝗虫入侵, 以及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影响, 给数以百万计的人带来了无尽痛苦。人们无止境地迁移。下周世界将齐聚一堂, 在“我们想要的未来, 我们需要的联合国: 重申我们对多边主义的集体承诺——通过有效的多边行动抗击冠状病毒病”主题下, 庆祝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 而移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则在为生存而躲避恐怖袭击, 并希望未来将是光明的。

应对环境退化的挑战有不同的方面。首先是消除引发这一最初冲突的发展问题的根源。第二个方面是处理冲突爆发的后果, 人们认为冲突一旦发生, 就会与气候变化或环境退化联系在一起, 在这方面, 安全理事会处理冲突的经验可能有所帮助。显然, 需要采取整体办法来处理环境退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在这方面, 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支持首要的联合国各组织和进程, 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其他多边环境协议, 以及非洲联盟(非盟)等相关区域组织的工作。这些合作将确保安全理事会能够获得关于冲突环境中气候或环境相关安全风险的潜在影响的信息。

《气候公约》几近获得成员国的普遍批准, 坚持寻求促进公平的原则, 承认需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 以及该公约对发达国家向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执行支持手段的法律义务。我们认为, 《气候公约》及其《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也将促进就所有会员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需采用的敏感变化开

展持续的多边谈判,同时也提供各项机制来保障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空间。

南非完全支持以《气候公约》指导原则为前提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办法,这些原则包括公平、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需行动以及向所有需要支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在国家一级,我们正在优先考虑向更公平和可持续的生产、消费模式进行公正的过渡。在非洲大陆一级,非洲联盟正在制定非洲绿色刺激方案,作为对非洲联盟从COVID-19大流行病中恢复的总体努力的贡献,这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所有三个支柱。

我们继续期待安全理事会履行其国际和平与安全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有兴趣听取安理会成员的意见:安全理事会可以为应对环境退化对和平与安全的人道主义影响增添哪些附加价值。

毫无疑问,显然需要在有效的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领导下加强全球团结。

附件15

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谨感谢尼日尔组织本次会议，并选择在其中一场标志性的活动上聚焦气候变化的人道主义影响，这是我们在讨论气候与安全时需要更多关注的一个主题。我感谢各位通报人非常翔实的介绍。

气候变化正在影响我们的环境。这是基于科学数据的无可争辩的现实。日益严重的气候破坏和环境恶化正在日益影响全球人口。然而，这种影响虽是全球性的，但并没有让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感受，也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事实上，最严重的影响发生在索马里、也门、苏丹和萨赫勒等地区，当地民众应对和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严重下降。

正如通报人的明确描述，最脆弱的民众，包括流离失所者、难民和生活在冲突地区或原本就在遭受恶劣经济条件影响的人，过分地受到干旱、洪水、风暴和高温的影响，适应这些极端情况和额外风险的能力有限。

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加上暴力和武装冲突，加剧了现有的脆弱性，加深了这些人的困境，使他们的生活更加悲惨，加重了他们面临的人道主义灾难。一场饥荒灾难正在逼近也门。

当气候紊乱遇上冲突时，只会恶化粮食和经济不安全，加重健康差距，限制获得基本服务和资源，同时削弱政府和机构向当地民众提供支持的能力。

在乍得湖区域，1000多万人原本就依赖人道主义援助，气候变化加剧了用水用地方面的紧张局势，这导致更多人被迫流离失所，特别是在中央当局控制领土、管理资源和解决紧张局势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这种危机重叠的影响非常大，要求我们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使我们的对策和行动适应人们的状况和优先事项，而不仅仅是眼前的需求和及早行动，以帮助受冲突影响的族群更能适应环境恶化和不断变化的气候。这种对策需要依赖于对短期和长期气候风险的更深入理解。它需要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并在多个部门和许多不同国家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这尤其是因为气候变化也带来了可能加剧现有武装冲突局势和其他暴力局势的挑战。

这种气候变化与安全的关系变得更为明显并且在国际上日益得到认可，安全理事会应进一步加以考虑，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多地与冲突根源相互作用，使风险倍增。

今天，除了针对具体情况的办法之外，我们必须采取综合和系统性的办法来应对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以便安全理事会能够做出适当应对。我们也必须将长期气候风险因素纳入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对和平与安全威胁的评估和管理。为了防止气候风险导致的冲突，我们还需要开发预测工具和预警系统，此外还要加强联合国系统的科学数据和相关知识数据库。

最后，突尼斯作为在气候和安全问题上观点一致国家集团的成员，谨重申，这些问题必须保留在议程上，并需要安全理事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附件16

美利坚合众国驻联合国政治协调员罗德尼·亨特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有你加入我们今天的安理会会议，尽管是虚拟会议。美国感谢今天有机会思考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武装冲突造成环境破坏的例子，知道这会如何影响脆弱环境中的人道主义状况。

自2004年时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强调环境、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以来，本机构讨论了环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方面影响。众所周知，对水资源和可耕地的争夺日益加剧，是导致乍得湖流域和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三国边境地区冲突的重要因素。当地多种非国家行为体数量激增，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民兵和有组织犯罪实体助长暴力，破坏其活动环境，使久拖不决的复杂人道主义危机长期存在。

在冲突时期，非法开采资源被用来支持和助长冲突，对当地居民造成极大危害。事实上，自然资源的开采和相关环境压力经常成为整个冲突周期的一部分。矿产、木材、野生动物、土地和水资源会很快成为争夺对象，对它们的开采可能会资助冲突，相关环境退化和社会动荡可能会破坏和平前景。不幸的是，全球有太多这样的例子。2017年，所谓伊斯兰国点燃了伊拉克摩苏尔市周边的油井和硫磺厂，导致毒云大面积扩散，污染地貌，毒害民众。

那些卷入冲突的人将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用作避难所，例如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接壤的加兰巴国家公园，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龙加国家公园和霍加狒野生动物保护区。由于与冲突相关的偷猎和野生动物贩运、非法伐木和非法采矿，这导致地方保护动植物物种大量减少。

在哥伦比亚，非法武装团体不断争夺农村地区的资源，其中一些地区在2016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前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控制。令人关切的问题包括掠夺土地和砍伐森林、非法采矿、古柯种植和可卡因生产。2016年新砍伐的森林公顷数比2015年增加了44%，2017年仍在继续增长。2018年，森林砍伐有所减缓，但仍然是哥伦比亚最严峻的环境挑战之一。

在委内瑞拉，马杜罗·莫罗斯非法政权参与谋划并获利于非法金矿开采，破坏该国南部的环境，摧毁土著居民。武装犯罪集团，包括一些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哥伦比亚团体，正在肆意污染土地和水资源，秘密输出每个委内瑞拉人生来有权享有的财富。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说明冲突期间的环境破坏是如何延长这些冲突对无辜人民的影响的。冲突即使在结束后，其环境影响也会阻碍个人的恢复能力或直接导致个人无力恢复，包括阻碍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安全、有尊严和自愿返回家园。

环境破坏的经济影响不仅表现在直接经济损失上，还表现为冲突后修复环境的相关费用。美国与许多国家政府合作，帮助弥补冲突造成的环境破坏的影响。

2018年，美国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中部非洲区域环境方案，针对上帝抵抗军在中非共和国东南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地区贩运野生动物的问题采取了行动。中部非洲区域环境方案的合作伙伴与生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兰巴国家公园和中非共和国欣科自然保护区目标保护地区附近的社区合作，控制野生动物偷猎和贩运，这是在该区域活动的团体的一个资金来源。

这些活动消除了安全和治理真空，扰乱了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运作。这些方案加强公园保护区的管理，同时改善了该地区的安全和法治，确保护林员能够保护公园，追捕偷猎者和其他开展非法活动的人，并与周边居民合作，以负责任的方式保护和管理公园的资源。

由于这种支持，偷猎的大象数量从2017年的每年100头下降到了过去两年的每年不到10头。上帝抵抗军和其他武装团体在加兰巴行动区内袭击村庄的次数从2015年的68次减少到了2019年的仅1次。

美国和哥伦比亚于2018年签署了一份旨在打击非法金矿开采的谅解备忘录，支持将其规范化和正规化，共同努力发现和消除汞的使用，加强非法采矿的合法经济替代办法，加大力度发现和监测受非法采矿影响的地区，并加强执法能力，预防、控制、调查和起诉与非法开采矿产有关的犯罪。2017年与秘鲁签署的类似谅解备忘录成了哥伦比亚谅解备忘录的基础。我们还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应对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非法政权和其他犯罪行为体推动的委内瑞拉非法采金活动对环境和安全造成的灾难性影响。

越南战争带来一个令我们美国人更加感同身受的敏感问题，涉及一种对人类健康产生长期严重影响的化学脱叶剂。美国一直致力于支持越南努力清除二恶英即橙剂的污染。2018年，美国结束了对为期六年、耗资1.1亿美元的大南机场二恶英环境修复项目的支持。2019年12月5日，美国和越南宣布进一步支持越南在边和空军基地的二恶英修复工作，并承诺提供3亿美元，用十年努力来修复该空军基地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

最后，如我们本周刚刚讨论的、今天其他人也提到的那样，我们必须就也门沿海的“FSO SAFER”号油轮紧急采取行动。很少有潜在的环境灾难如此迫在眉睫。如向安理会详细通报的那样，如果不处理这一情况，不仅会对也门，而且会对该区域的许多地方造成灾难性的环境和人道主义影响。

最后，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不要忽视冲突的环境层面及其给受影响人口造成的经济和健康影响。

附件17

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邓廷贵的发言

越南深切赞赏主席国尼日尔发挥领导作用, 召开本次适时的辩论会。我谨感谢各位通报者所作颇有见地的介绍。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包括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缺水、干旱、土地退化、海平面上升等, 会导致粮食无保障、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社会紧张局势。它们还与管理不善和武装冲突中的破坏导致的生态系统退化有关。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退化造成的这些人道主义影响在世界许多角落日益显现。在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地区, 救生资源的供给和可及性减少, 因此, 数百万人的生命不得不依赖每年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除非得到消除或减轻, 否则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可能恶化脆弱的政治和安全局势, 延长、加剧甚至引发冲突和不稳定。

我们相信, 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系统退化及其人道主义和安全风险的不利影响应成为我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一部分。我国代表团谨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 我们在作出应对时必须开展跨界合作。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 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必须特别注意处于冲突或冲突后局势的国家、有人道主义需求的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因为它们特别容易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但往往在应对能力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

第二, 可以而且应该将气候适应能力纳入人道主义、预防冲突、建设和平和冲突后战略。我们欢迎安理会在13项针对具体国家的决议中进一步认识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我们注意到, 规模最大的10项和平行动中就有8项部署在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安理会在开展审议工作和采取行动时必须基于科学和充分证据, 并针对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国情采取相应的办法。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和特别政治任务可帮助加强安理会对其议程上局势中气候变化造成的安全和人道主义风险的分析。

第三, 安理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需要与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及其所有伙伴进行协调。在这方面, 我们谨强调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建设区域复原力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合作。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我们将加强从事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工作的人员和机构的能力作为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2025的一项战略措施。可进一步探讨联合国与东盟在这方面的合作。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 国际社会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包括生态系统退化造成的人道主义和安全风险时, 必须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和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其他国际法规则。各国和全球应对行动必须继续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为指针, 而且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履行在这些协议下作出的承诺。

越南是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们支持一切旨在应对气候相关挑战的努力, 包括在安全理事会这里所做的努力。我们坚信,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枪匹马赢得抗击气候变化的斗争, 也无法独自巩固和平与安全。现在是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携手努力, 建立包容性伙伴关系, 以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的时候了。

附件18

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罗纳尔多·科斯塔的发言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召开辩论会，讨论环境退化的人道主义影响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萨赫勒区域。

各种自然现象——如平均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飓风、地震、干旱、荒漠化和土壤流失等——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需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和仔细研究。

会员国有义务在多边和区域组织的支持下，尽其所能，协助脆弱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国家，以减轻痛苦，特别是赤贫者的痛苦。

在从和平与安全的角度审议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退化的人道主义影响的行动之前，还必须强调国家对自然资源管理的主权及其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的首要责任。

巴西认识到，自然现象，无论是人为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都可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成为加剧安全挑战的因素。环境退化的人道主义后果在萨赫勒区域尤其严重，贫穷、社会不平等、治理不力、粮食不安全、人口迁移和暴力极端主义等其他因素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根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其结果是，截至去年6月，萨赫勒需要救生援助和保护者达到创纪录的2400万，其中一半是儿童。

面对此种复杂的多层面现实，环境退化对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的严重影响必须由安全理事会视个案情况处理，同时考虑到有关国家和地方的特点。第2349(2017)号决议是这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率先确认，环境因素可能是乍得湖流域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

在涉及环境与国际和平与安全议程之间的联系时，必须谨慎行事，不要草率下结论，将相关性误认为是因果关系。巴西认为，了解武装冲突给环境带来的不利后果以及环境如何反过来影响当地居民尤为重要，而不是强调环境退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此外，维和行动必须考虑到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以减少其在实地的环境足迹，促进当地族群的健康和安全保障。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根据巴西在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成功经验，在国际组织主持下，努力制定特派团环保做法指南。

此外，从巴西的角度来说，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是不可能靠军事办法来解决的现象。这些挑战必须主要使用发展工具来应对，避免过度安全化的风险。

联合国系统依赖一系列负责处理环境问题的论坛和机构，其中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会第二委员会、建设和平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

对于手头这个事宜纯属人道主义的层面，也必须进行类似思考。人道主义危机需要人道、建设和平以及发展等各种行为体的密切合作，在萨赫勒尤其如此。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任何模糊人道主义援助与军事行动之间界线的做法会危及讲原则的人道主义行动，也间接危及人道主义准入和人道主义工

作人员的安全。在武装冲突中,各方必须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其它适用法律制度,遵守其所承担的保护环境的义务。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今年5月份的一项报告中指出,政治化和军事化是对萨赫勒人道主义行动的主要威胁。

当然,与武装冲突有关的人道主义危机已经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过,大多是与具体冲突局势下的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一起讨论。安理会在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与在环境问题上一致,国际社会可利用专为处理各方面人道主义问题而设的论坛和机构,如大会第三委员会或者每年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道主义事务部分,今年的该会议包括了一项活动,讨论萨赫勒面临的各种彼此关联的挑战,尼日尔本国的人道主义事务和灾害管理部长为该辩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国际法委员会目前正在研究保护环境与武装冲突的关系这个话题,该问题非常复杂,再怎么评估都不为过。

会员国有责任留意联合国系统不同机构之间的分工,在寻求协同增效与互补的同时,保留其各自的任务授权和主管职能。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需要国际社会立即予以关注的具体威胁,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虽然安理会的活动与环境和人道主义问题确有发生关联之处,但是成员范围更广、更具代表性的其它论坛负有全面处理这些问题的主要授权。把安理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宪章》赋予其授权之外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可能多么紧要—这些问题常常至关紧要—是有害无益、适得其反的,有可能损害多边机制的妥善运作。

附件19

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马丁·比尔·赫尔曼的发言

我高兴地代表北欧国家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以及我本人的国家丹麦提交本发言。我们高兴地看到安全理事会持续关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和平与安全动态，欢迎今天有机会讨论环境退化的人道主义影响这个问题。

气候变化是一个风险倍增因素。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和造成的人员成本正在变得日益明显，同时武装冲突的存在则削弱了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环境退化和气候影响深化了造成脆弱的根源，加剧因土地和水资源稀缺或恶化而起的紧张，是导致粮食无保障的主要动因。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可引发或者恶化冲突、流离失所和移徙，逆转辛苦得来的建设和平与发展成果，增加人道主义苦难，我们在也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千百万民众濒临饥荒的边缘。气候变化也是生物多样性流失的一个主要动因，而该问题是导致当前空前的卫生危机进而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源之一。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连贯、协调地处理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请允许我强调三个主要因素。

首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有效预防和应对与气候有敏感关系的冲突的一个前提。联合国必须与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包括气象服务在内的各种气候行为体以及民间社会协作，改进预警工具和冲突预测模型，把气候信息系统地纳入冲突分析与业务计划。气候安全机制可在这方面发挥支持和协调的作用。我们还必须把冲突分析纳入气候形势分析以及减灾和适应工作。我们鼓励努力授权秘书长定期全面报告气候与安全之间的关联。

其次，要可持续地处理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就必须增加全系统对减少灾害风险、抵御气候冲击的准备工作、增强复原力工作、适应能力以及加强对冲突敏感认识的投入。为此，采取一种把人道主义-发展-建设和平统筹结合的做法至关重要，这包括我们筹措资金的方式、联合分析以及我们在实地工作的方式。对长久危机的继续支持应当与更长期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做法相结合。必须从应急规划和执行的一开始就处理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以及冲突的问题，以便更有效地减轻其叠加影响。

要把重点从被动应付转为主动应对，我们就必须在保障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的战略上进行投入，还必须投入于长期可持续的粮食体系、社会保护、技能开发以及创造就业，侧重于在受冲突影响的气候敏感地区建设社区的长期复原力，否则，边缘化最严重的弱势群体可能迁离这些地方，或者被迫移徙。施政有方、机构有力且反应敏锐对于提高抵御气候方面安全风险的复原力也极其重要。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为这些努力提供了蓝图。

第三，尽管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蓄意攻击自然环境，给自然环境和民众健康造成严重破坏，但是这些袭击仍在继续。安理会已经在处理冲突和自然资源方面的问题，但是它还可提供一个平台，在一个连贯的框架内对进行之中的国际法律和政策讨论进行补充，从而把国际法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联合国环境大会等其它论坛的工作衔接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国际法委员会当前就保护环境与武装冲突的关系所做的工作，也欢迎更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在武装冲突局势下保护自然环境的指导方针以及最近的其它举措。

我们知道, 适应气候变化和预防冲突的战略要取得成效, 就必须本着受影响民众的需求和现状。妇女和女孩是提出解决办法的重要行为体, 她们常常受到气候方面安全风险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应对该问题必须把一种立足于权利的多利益攸关方的做法作为核心, 推动妇女、青年、土著人民以及边缘群体包容和有意义地参与。

最后, 处理气候与安全之间的关联需要一种全系统的做法, 纳入整个联合国大家庭、双边捐助方、国际金融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气候变化、脆弱性和冲突问题的交叉凸显出急需统筹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保持和平议程。

附件20

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塔耶·阿茨克塞拉西·阿姆德的发言

我首先要祝贺尼日尔在联合国漫长历程中的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主席先生，我们赞扬你召开今天这场及时的辩论会。我们感谢所有通报人。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巨大威胁。气候引发的灾害，如山洪爆发、气旋、强风、暴雨、持续干旱和蝗灾，正在颠覆世界各地数百万人的生活。我们对和平与发展的集体渴望正面临气候引起的压力的严峻考验。

事实上，我们无法将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分开。人口增长、移民、农业扩张和工业化往往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损失。

众所周知，争夺日益稀缺的资源加剧了族群紧张局势，导致冲突和人道主义需求增加。包括我国在内有数百以万计的人已经在依赖每年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甚至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爆发之前，人们就已预测这一趋势会在未来几十年内恶化。我们认为，扭转这一趋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多层影响需要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和对多边主义的真正承诺。

显然，气候变化加剧了新老挑战。它的负面影响超越了国界。因此，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跨界性质应促使我们就减缓和适应以及自然资源利用和管理战略问题在各个层面寻求强有力的合作。

我们环境的健康和未来取决于会员国以及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集体和协调努力。穷人，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穷人，对这一问题成因的责任最小，但他们首当其冲受到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的影响。为了减轻这种灾难，发展中国家需要在风险评估方面的能力建设支持，并发展预警系统，建设本地抵御气候和环境变化的能力。必须鼓励和支持防治荒漠化和干旱的区域努力，如非洲联盟领导的绿色长城倡议，该倡议努力在萨赫勒以及从达喀尔到吉布提一带种植树木和其他植被。

安全理事会应探索帮助最脆弱国家和地区机制，包括努力将环境退化的影响纳入整个建设和平架构的主流。在萨赫勒、乍得湖区域和非洲之角地区国家，气候变化破坏稳定的影响减缓了和平与繁荣的进展。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环境变化、威胁生命的经济问题和缺乏社会凝聚力使得“博科圣地”和青年党等恐怖团体能够利用当地族群实际存在的不满和发展需求。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联合国的建设和平、预防和维持和平努力应当将速效项目等方案纳入各自的优先事项和任务，支持当地面对助长环境退化的气候变化和因素努力减轻脆弱性。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0个最大的和平行动中，有8个部署在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

气候变化必须成为我们各国、各区域和国际上所有政策干预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埃塞俄比亚人正在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消除导致环境退化的生态因素，包括荒漠化、缺水或水流失、土壤侵蚀和非法开采自然资源。

在这方面，2018年启动的绿色遗产倡议不仅仅是一个养护或造林项目。这是我们10年国家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设想是打造绿色和具有气候适应力的经济。该计划促进具有气候适应力的农业，以防止生态系统恶化，包括加强小泉水和湿地的恢复。这是我们国家的当务之急。

我们坚信，我们终结饥饿和贫困、确保获得卫生设施和可持续能源、保障青年和妇女的体面工作的能力都取决于我们当前采取的行动。我们必须提高公众对环境变化危险的认识，让我们的公民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绿色遗产倡议的背景下动员了各行各业的埃塞俄比亚人，光是今年在COVID-19大流行环境下就种植了50亿棵树苗。这现在已经成为一年一度的传统，我们看到人们对环境和养护的态度发生了令人鼓舞的转变。我们的目标是到2024年种下200亿棵树苗。

我们努力克服政府间发展组织和非洲之角区域与气候相关的多方面挑战，这值得合作伙伴的关注和大力支持。埃塞俄比亚、苏丹、南苏丹、索马里和肯尼亚的洪水已经使成千上万原本就脆弱的人流离失所。整个区域的大规模蝗灾也使本已缺乏粮食安全的族群陷入困境。对于这些流离失所族群的储备损失，需要强有力的补充行动，以防止资源引发的冲突和不可控的迁移。

最后，为了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重建得更好，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加倍开展多边努力，以实现我们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及《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作出的承诺。我们欣见安全理事会近年来给予这一问题应有的关注。我们认为，在这一领域，整个联合国系统应继续深化合作和伙伴关系，以期为国家和区域努力提供切实的能力建设支持。

埃塞俄比亚仍然充分致力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加快履行我们就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影响问题所作的国际和区域承诺。

附件21

欧洲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们欢迎尼日尔共和国倡议就环境退化的人道主义影响以及和平与安全这一重要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

候选国北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稳定与结盟进程国及潜在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和格鲁吉亚赞同本次发言。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不利后果仍是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最关切的问题，因为它们破坏和平与安全、全球可持续发展、水安全、健康、经济繁荣、粮食安全和生计。气候变化是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和生物多样性的生存威胁，需要紧急采取集体应对措施。

在2020年1月欧洲联盟理事会关于气候外交的结论中，欧盟成员国再次承认气候变化如何成倍加剧国际稳定和安全遭受的威胁，尤其影响到最脆弱和最易受伤害的局势。

欧盟认识到，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增加了人道主义危机、流离失所和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脆弱国家，而且原本就受这种危机影响的群体，包括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儿童、老人、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对此的感受最深。这种情况在受干旱和洪水影响的冲突地区尤其明显，如萨赫勒、尼日利亚东北部、索马里、也门和南苏丹。妇女和女童受到气候变化和灾害的过大影响，把她们纳入决策过程是建设包容性复原力的关键所在。

保护环境、通过全球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是促进和平、安全和可持续生计的手段。

欧盟致力于通过一项关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环境保护的雄心勃勃的政策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这项政策载于《欧洲绿色协议》之中。减少排放，以求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的欧盟，提高能源可持续性和效率，建设资源节约型循环经济，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些将最终在全球增强的复原力，降低未来争夺自然资源冲突的风险。

按照欧盟的方法，可以通过全球合作和多边渠道，特别是通过三项《里约公约》、《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水事公约》，更有效地减轻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减轻环境压力。

通过建立复原力，并通过有前瞻性的减少风险行动、预警和早期行动，可以防止灾害演变成灾难。提高全球气候适应能力和减少灾害风险是欧盟的一个优先事项，特别是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努力，这些国家极易受到灾害、气候变化、洪水和干旱以及水安全威胁的影响。作为《欧洲绿色协议》的一部分，欧盟将通过一项新的、更雄心勃勃的欧盟气候变化适应战略来提高适应能力，增强复原力，并且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该战略将于2021年年初通过。欧盟支持国际气候行动的承诺将得到资金支持，至少25%的欧盟发展合作资金将分配给气候变化领域。

欧盟的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相联系办法旨在解决冲突和强迫流离失所的根源，包括与灾害有关的流离失所，并尽量减少其影响，加强个人和社区的复原力是欧盟支持的核心。风险和影响评估有助于更好地预见可能导致流离失

所的和气候/灾害相关的潜在问题。欧盟没有放开诸如1951年《日内瓦公约》等法律文书的适用领域，但支持努力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把现有法律框架应用于与环境有关的流离失所问题，找出缺口并加强这方面的指导。欧盟人道主义援助不仅在灾后帮助流离失所人口，还支持当地的减少风险、做好准备和针对增加的风险采取早期行动能力。

在我们评估冲突风险时，我们应该把气候、水和环境退化风险作为威胁倍增因素统筹考虑。气候和保护问题日益成为人道主义干预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同样，气候和环境行动应该对冲突敏感。不仅必须加强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还必须加强与平民保护、气候科学、民间社会和军方之间的合作。在由于更频繁和更恶劣的天气事件而要求武装部队作为最后手段支持灾害管理和救济工作时，必须确保有效的人道主义军民协调。

欧盟及其成员国还致力于在全球倡导通过支持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满足平民的保护需求，在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环境的破坏和退化，无论是由于把环境作为战争武器使用，还是由于袭击和导致冲突持续存在的活动造成的破坏，最终都会阻碍依赖自然资源维持生计和福祉的受冲突影响人口复原。它还可能导致对生态系统不可挽回的损害，降低自然和社会对灾害和气候变化不利后果的复原力。欧盟尤其谴责把获得用水机会作为一种武器。

欧盟及其成员国重申，我们承诺在我们与伙伴国家的战略交往中继续考虑气候和环境因素及风险，包括水方面的因素和风险，并致力于预警系统等预防措施。我们继续鼓励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系统为安理会创造一个关于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全面信息基础，将短期和长期气候和环境风险因素充分纳入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对和平与安全威胁的评估和管理，并利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专门知识，制订应对这些威胁的行动对策，同时加强实地的联合国特派团。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战略中，还应始终考虑与气候和环境相关的安全风险，建设和平委员会在这类风险方面的咨询作用应得到加强。欧盟赞赏“恢复与建设和平评估”，我们认为这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欧盟之间宝贵的伙伴关系框架，有助于形成对冲突、危机和不稳定背景的共同理解。

附件22

危地马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危地马拉祝贺尼日尔共和国担任安全理事会9月份主席，并感谢它召开本次高级别视频公开会议，讨论环境退化人道主义影响与和平与安全问题。我们也感谢所有通报人的发言。

极端天气事件、疾病传播、人道主义危机、流离失所、贫困加剧、干旱和饥饿，这些只是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对维持我们各国社会和平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的一些例子。灾害还可能加剧现有冲突，改变其形式和持续时间，并导致爆发新冲突，加剧分裂。

危地马拉是最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国家之一。过去几年中，极端天气事件和漫长的旱季对我们人民的生计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干旱走廊地区，那里的饥饿和贫困增加了人们移徙的压力，降低了我们家庭的复原力。

例如，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危地马拉和我们地区受到热带风暴的影响，表明了此类天气事件会如何逆转已经取得的成就，并进一步增加对生计、国家预算和治理的压力。

我们充分认识到，目前急需在国际一级加强努力，实现更可持续和更能抵御气候变化的发展，以包容性为侧重点，这将有助于更和平的社会的到来。

就全球而言，我们拥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工具。必须充分执行所有相关的多边环境协议，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从而建设和平、公正、繁荣和包容的社会。

危地马拉强调，必须建立预警系统，投资于科学和创新，以求缩小技术差距，发展人力资本，促进和平教育和尊重环境。团结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是关键所在，投资于长期发展战略也是关键。重要的是加强地方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参与，并采取全社会办法增强妇女、青年和土著人民的权能。

但是，为了制止目前破坏社会和经济复原力的冲突诱因，仍有一些缺口需要我们去填补。预防性外交必须处于我们努力的核心位置。大力开展预防和建设和平工作，明显有利于应对危机，防止冲突的长期破坏性影响。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同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我们强烈呼吁克服会员国之间和整个联合国持续存在的各自为政现象，加强联合国在世界各地行动的三大支柱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在整个系统内加强协调，并投资于建设和平项目。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附件23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们感谢组织者召开今天关于环境退化的人道主义影响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讨论会。

环境退化不仅影响生态系统，也影响依赖生态系统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这也是一个多层面问题。首先，如果它是由那些生活在生态系统中的人造成的，那么导致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主要是贫穷，而未必是贪婪。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此类问题源自与生活在温饱线上的人们有关的各种问题。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是否要把贫困和生计农业视为和平与安全问题的

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导致环境恶化者很可能在国界之外，而受害者却在国内。那么，是否和平与安全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模式，还是说，加强各项协议的执行是更适当、也许更有效的方式？

与人类活动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环境退化会产生人道主义影响或后果。然而，仅仅将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一切同和平与安全联系起来，无助于增进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无助于我们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或揪出真正的肇事者，以使其遵守对环境问题的承诺，并帮助改变生活在温饱线上的人们们的行为。

在安全理事会内外，人们日益倾向于开始在讨论环境问题时在某种程度上无视指导关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专题的环境讨论的各种重要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偏离这些原则和其他承诺，或试图以掩盖对处理这些问题负有责任者的方式来讨论此类问题，只会使真正的问题受到忽视，并使有意义的讨论变得难以进行。

因此，将环境退化与人道主义影响、然后再与和平与安全联系起来，并不能真正加强我们为应对环境退化所做的集体努力。我们所需要的，是拿出集体意愿，从多个层面处理此类重要问题，同时不逃避我们各国在各项重要公约——特别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之下所作承诺。

因此，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履行在各项环境协议下所作的承诺，做出承诺的贡献，而不是将环境问题视为安全问题。

我们赞扬受影响国家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做出努力，并采取各种举措，以解决影响普通人生活的人道主义问题。我们还呼吁有能力的国家协助这些国家，特别是遵守各项相关公约规定的义务。这将确保环境退化和随之而来的人道主义问题以协作方式得到处理，而不会形成潜在的冲突地区。

还需要对各国的能源组合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其中许多国家的能源组合并不是它们自己所选择的。我们应该抵制用一支画笔描绘所有能源组合各异的国家的诱惑。试金石应该是它们各自的承诺是否得到履行。妖魔化某种特定能源，并呼吁采取行动，而不允许向有机能源过渡——这需要巨大的承诺，于事无补。

同样重要的是，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环境退化与和平与安全之间存在联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9年发布的《气候变化与土地特别报告》第四章指出：

“土地退化可能引发对稀缺自然资源的争夺,进而可能导致移民和/或冲突,不过,尽管有适度证据,文献中的一致意见也很少。”

换言之,即使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完整的科学证据,也没有明确显示环境退化是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印度是气候行动的重要推动方。过去几年,我国每年减少碳排放量3800万吨。过去十年中,新增森林和林木覆盖面积约300万公顷,使森林和林木覆盖面积合计占全国总面积的24.56%。展望未来,印度的目标是恢复2600万公顷退化和被伐林地,并在2030年之前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我们还制定了其他目标,即到2022年消除一次性塑料制品,以及到2030年安装450千兆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

印度为保护环境承担起了牵头者的角色。我们分别于2020年和2019年举办了《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三次会议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四次会议。

展望未来,我们每个人,包括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政府,都可以在生活方式上作出更有利于气候的选择,以促进向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过渡。让我们将环境退化视为加强多边主义和寻求公平、包容各方的解决方案的机会,建设一个更环保、更清洁和更可持续的世界。

附件24

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爱尔兰谨赞扬尼日尔主持本次辩论会。

环境压力会放大脆弱地区其他导致脆弱性的因素，破坏和平与稳定。国家和社区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因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退化而受到限制，特别是考虑到土壤、空气和水污染、生物多样性损失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今年，极端天气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天气模式再次对萨赫勒、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这样相距遥远的不同地区造成破坏。我们痛苦地了解到，森林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正在为新的传染病创造条件，同时也让我们原以为被抑制住的疾病卷土重来。

当大流行病、冲突和气候变化交织在一起时，人道主义危机变得更具破坏性，需要更复杂、更昂贵的应对措施。

冲突，特别是爆炸性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甚至在敌对行动结束很久之后仍继续对社区产生影响。武器在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其生产、储存、使用、遗弃和处置——中可能会造成重大环境影响。

我们也必须注意武装冲突中自然资源的使用情况。例如，武装反对派团体在乍得湖周边战术性地使用农村和森林地区，阻碍社区获得这些重要的自然资源，破坏他们的生计。

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在其和平任务中处理环境因素。在这方面我要说四点。

首先，我们可以在最近积极事态发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设立气候安全机制和气候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可以为联合国系统提供重要的分析能力。这必须贯穿其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工作。爱尔兰继续呼吁任命一名气候与安全特别代表，为这些努力提供更多支持。

其次，不能忽视环境退化对妇女和青年产生的格外严重的影响，因为其对健康、教育、生计和粮食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并增加性别暴力的风险。支持地方自主权、改善领导力、确保妇女和青年参与冲突和脆弱环境中有关自然资源的决策和治理进程，对于有效建设和平仍然至关重要。

第三，维和行动必须继续应对导致不安全的环境因素，同时也要日渐意识到自己的环境足迹。我们必须继续考虑酌情将气候与安全纳入维和任务，并为全面执行联合国特派团环境战略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最后，我们必须解决武装冲突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这意味着确保冲突各方遵守禁止攻击自然环境的国际人道法，此外也有责任确保人道主义行为体不受阻碍地前往有需要的社区。我们还可以借鉴《禁止核武器条约》中关于环境修复的规定。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和平和防止冲突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解决当前面临的与环境气候有关的挑战，就不可能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爱尔兰作为安理会新成员，将继续推动这一问题，推进联合国旨在实现和平的集体努力。

附件25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石兼公博的发言

我谨感谢尼日尔组织本次会议，讨论环境退化的人道主义影响与和平与安全问题。

环境退化，特别是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环境退化，正在对世界各地人民的生存、生计和尊严构成广泛和跨领域的挑战。缺水、干旱、荒漠化、土地退化和粮食不安全正在使萨赫勒等干旱地区的人们深受其害。海平面上升，海岸线受侵蚀，危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安全。虽然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正在危及全球每个角落的人类安全，但面临严重人道主义挑战的总是受冲突影响的最弱势群体。

在国家和地方机构无力保护平民和社区缺乏复原力的地方，环境退化可能成为不稳定的诱因，危及和平与安全。因此，需要对各种不稳定因素，包括第2349（2017）号决议所确认的气候和生态变化对乍得湖流域地区的不利影响，进行适当的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战略。

日本认为，解决环境退化、尽量减少其人道主义影响和防止冲突复发的关键是机构建设。机构不仅限于安全和司法系统，还包括经济和社会系统，后者使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公共部门能够向人民提供保健和教育等基本服务。建立包容、可问责和有效的机构，将有助于减少脆弱性、确保人的安全和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日本在建设和平委员会中一贯强调这些要点。

我们认识到，非洲大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它在管理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方面所作的准备最少。在去年于横滨举行的第七次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东京会议）上，日本重申致力于努力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日本支持在第七次东京会议上发起的《非洲和平与稳定新方法》倡议下的非洲机构建设努力。

日本还通过“太平洋岛屿领导人会议”和“日本-加勒比共同体”框架，促进与受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严重影响的其他区域国家的对话。日本已承诺在2020年提供1.3万亿日元支持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

最后，我谨强调，联合国必须在促进国际合作以采取有力行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便从各个方面解决环境退化对和平与安全的人道主义影响。日本将毫无保留地成为这一努力的积极伙伴。

附件26

列支敦士登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安·韦纳韦瑟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再次利用你担任主席的机会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气候变化问题。尽管安理会最近在7月份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见S/2020/751)，但我们必须再次紧急处理这一问题。事实上，鉴于我们所处的危险局势，列支敦士登必须强调，安理会迫切需要就我们时代的关键系统性安全问题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

11年前，大会首次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气候变化对安全影响的报告(A/64/350)。今天辩论的概念说明(S/2020/882，附件)还指出，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是安理会两年前首次提出的。然而，根据今年的《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各国并没有注意到这些警告。自《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签署以来的五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在未来五年里，世界升温1.5°C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至少是暂时的——这一阈值在巴黎谈判中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点。有些人可能记得我们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同事在巴黎发出的呼吁：“1.5°C才能存活”。

安理会——其少数成员集体排放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二氧化碳——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这些排放将直接造成大规模的不安全，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全体人口将死亡，国家将变得无法居住——将是对我们的星球和那些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犯下的罪行。

概念说明中讨论的暴力和武装冲突是这种死亡和毁灭的征兆。我们知道，在安理会已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局势中，例如在乍得湖盆地和索马里，以及在安理会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的局势中，特别是在叙利亚和也门，荒漠化、水资源的减少以及粮食和水的不安全已经导致了暴力冲突。气候变化的某些次要影响，如非自愿移徙的增加、贫困、生计的丧失以及农民和牧民之间的社会紧张关系，本身导致了冲突，安理会在某些情况下欣然接受了这一事实。

但是，尽管安理会认识到这些相近因素很重要，但它也必须追溯其根源。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未能进行有效的预防和维持和平，并且无视人的安全，采用一种只从武装根源和解决办法的角度认知冲突重要性的范式。

安理会在如何更好地应对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方面不缺少建议。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不安全的根源，并相应地认识到有必要在受影响者诉诸武装暴力之前解决人类不安全问题。

安理会已经可以利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广泛专门知识，例如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安全机制以及其他专门机构的专门知识。它应该寻求制定一项关于气候与安全的决议，作为一个独立的议题，建立一个利用这一大量专门知识的报告机制。安理会还不妨考虑由联合国相关机构组成的工作队是否可以通过定期通报和以其他方式提供相关专门知识和信息，加强安理会在气候与安全关系方面的参与力度。

在此期间，更系统地提及全球升温对安理会议程上局势的影响，特别是非洲大陆以外的局势，是必要的，也是早就应该做的。最重要的是，安理会成员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减少排放，使弱势群体免受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必要破坏。只有当安理会成员的政策决定决定了安全威胁的规模时，才能够更有效地解决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全世界数十亿人的生活取决于今天关于避免气候灾难的决定。

附件27

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声明

我代表马耳他政府，感谢主席国尼日尔组织今天关于这个热门问题的辩论会，这个问题对整个国际社会也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马耳他完全赞同早些时候以欧洲联盟名义提交的声明(附件21)，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补充几点意见。

气候变化是对我们未来的主要威胁之一，如果我们要确保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保证我们的儿童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就需要作出集体努力。马耳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有所作为。安全理事会有各种机制来促进和努力建设一个团结一致应对这一生存威胁的国际社会。马耳他准备继续支持为确保所有人的可持续未来而正在进行的工作，并且如果受托在2023-2024年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的话，将为此而努力工作。

在我们评估气候变化和冲突造成的环境退化的破坏性和毁灭性影响时，马耳他认为，短期干预应该是长期战略的补充。如果我们要促进和平和避免冲突，预防性办法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免受极端天气事件或冲突局势的影响。从萨赫勒到东南亚，从太平洋到加勒比海、欧洲和地中海，人们正在死亡或被迫舍弃家园。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仍然极为被动，结果是行动被延误，启动了临时制定的机制。马耳他认为，仅启动一套工具是不够的，这些工具往往只是被动作出反应，并依赖灾害风险管控和人道主义援助等补充性工作。

相反，我们需要摆脱这种做法。由于我们未能认识到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对人类安全和社会经济福祉的影响，人类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害。我们如果稍停片刻，花时间真正评估一下周围的环境和氛围，就会意识到，往往有一系列错综复杂和相互联系的动因在起作用，共同激发动荡或冲突。这些动因是缓慢发生的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结果，因为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影响淡水资源、土壤流失、生物多样性、海洋资源、卫生健康和粮食安全。

虽然这些影响可能不会立即可见，但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受影响最严重的局势正是人们无法承受更多压力的局势。马耳他关切气候变化的后果，这些后果正在增加已经存在的人道主义局势的严重性，并威胁和平与安全。和平行动的工作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当前冲突的态势，因而使冲突更有可能变得激烈。

马耳他呼吁增加跨机构知识共享，并呼吁有关各方积极主动地把气候行动确定为建设可持续和平的机会。这将有助于在实地加大协调力度和获得更好的信息，使我们得以采取更加连贯一致的建设和平措施。在作出任何建设和平承诺之前，都应该对气候引起的安全风险进行彻底评估。

我们已经采取重大步骤鼓励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进一步汇合。然而，这只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难题的一部分。为有效化解我们的安全关切，马耳他认为，我们需要侧重于预防战略，这一战略应既具全面性、又具融合性：说它应具全面性，是指为应对气候或环境紧急情况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能够补充我们的长期缓解和适应努力；说它应具融合性，是因为我们还需要努力把环境和社会经济关切纳入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决策。

最后, 马耳他认为, 任何前瞻性办法都需要具有整体性, 把人道、政治和安全应急行动与长期发展和可持续和平结合起来。

附件28

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墨西哥感谢尼日尔召开本次辩论会,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角度讨论环境退化对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问题。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最近通过发表题为《2020年一致相信科学》的气候报告,提醒国际社会注意气候变化现象及其影响的严重性。该报告明确指出,全球90%的自然灾害影响是洪涝和干旱造成的。在这方面,墨西哥确认这一议题切合现实,并愿发表以下意见。

气候变化及其效应,例如荒漠化、干旱和土壤流失,以及海平面上升引发的洪涝,是造成人道主义等影响的一个风险因素,特别因为我们在一些区域看到,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产生了不利影响,造成民众流离失所。因此,所有分析都必须考虑到产生这些分析的具体情况,并把这些情况纳入为决策进程提供指导的多因素分析。

联合国系统必须作出多层面的、协调一致的反应。尽管安全理事会不是负责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威胁及其对环境退化产生的明显效应的机关,但这一威胁及其效应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可能会加剧动荡风险或现有冲突。因此,必须同驻实地各实体、包括人道主义行为体进行协作,获取科学证据,形成合力,以促进及时分析,提高本系统的决策和预防能力。

最近数月,体制架构得到了加强,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各协作机制进行的分析就属于有助于我们加强联合国系统所需能力的具体措施。

墨西哥坚信,安全理事会必须有扎实的、针对性的风险分析可用,以避免会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局势的情况。安理会成员还必须准备采取行动来加强本组织的预防能力,这必然意味着应系统地要求联合国及其所有实体作为一个真正的系统在内部下功夫。

附件29

纳米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内维尔·格策的发言

我祝贺尼日尔担任2020年9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它就这一非常重要的议题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还要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和因娜·莫贾女士所作的通报。

2007年4月，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王国召开的一次公开辩论会上首次讨论了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联系（见S/PV.5663）。此后，2009年，大会通过了第63/281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确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文书，并邀请

“联合国有关机构，酌情根据各自的任务，进一步努力审议和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包括它可能对安全产生的影响”（同上，第1段）。

安全理事会对气候变化给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不利影响的认识有所提高，就这一问题举行的各次会议，尤其是2017年4月10日的阿里亚办法会议、2018年的一次会议（见S/PV.8307）和2019年的一次会议（见S/PV.8451），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认识说明，气候变化与和平与安全之间存在着关系。2020年1月，尼日尔加入了安理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摆在显著位置，因为尼日尔就属于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已造成有目共睹的影响的国家之一。

武装冲突连同其起因、各个层面以及解决办法均与气候变化存在某种关联，这些因素的结合构成威胁，可逆转国家多年来取得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气候变化已被认定是一种威胁倍增因子，由此加剧原有的风险与挑战。当前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的局势就是具体例证。

下决心处理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样会促进和保护蓝色经济，因为这些努力的目的也是处理海洋与河流系统和问题以及那些威胁湖泊可持续性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得到处理时，引发暴力、危机以及冲突的那些条件将被先发遏制。

纳米比亚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温度升高、蒸发以及降雨多变形成干旱、缺水和洪涝。事实上，2019年5月，由于历史罕见的干旱，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哈格·根哥布先生宣布我国所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为此，纳米比亚建立了《里约三公约》—即关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防治沙漠化的三项《公约》—之间协同增效的制度。我们的此举依据这样的理解，即：土地是生物多样性能够蓬勃发展的基础。不制止土地退化和养复已退化的土地，我们就绝无可能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依靠健康的土地和旺盛的生物多样性，就绝无可能适应气候变化，并减轻其影响。

因此，纳米比亚欢迎即将到来的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主要是恢复已退化的土地。此外，纳米比亚欢迎2020年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的愿景设想了同大自然彼此和谐的关系，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受到珍视、保护、恢复并且广泛使用，生态系统服务得到维持，从而保持地球的健康，为所有人带来重要裨益。纳米比亚认为，这是一个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处理环境退化问题的框架，从而推动在冠状病毒病制造破坏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纳米比亚与冰岛一道,担任了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之友小组的共同主席。目前,该小组共有23个成员。我鼓励其它联合国会员国加入该小组,以便我们能够集体确保这些发展问题不被视为琐事,因而被搁置一边。

最后,我重申,纳米比亚将继续在国际社会发挥自身的作用,倡导合作以有效处理这些问题。我们根本承担不起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落后的后果,因为这种败举将消极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

附件30

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路易丝·布莱斯的发言

我谨祝贺尼日尔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并举行今天的辩论会。

我谨以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主席的身份，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建和委就其议程上不同地区、包括乍得湖流域、萨赫勒地区以及太平洋岛屿提出的一些意见与建议。

在建和委介入的多种局势中，环境和气候方面的挑战被认为是有可能消极影响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努力的因素。因此，处理具体国家或区域的这些挑战也可推动这些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努力。各种国内行为体已在过去的大量互动中强调，建设气候复原力也可被视为有利于建设和平。

就在上周，在建和委关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对乍得湖流域建设和平影响的一次会议上，通报人和该地区的利益攸关方生动地描绘了乍得湖面临的多层面挑战，特别是安全、人道主义以及发展问题上的挑战连同环境变化和退化以及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

与建和委先前的讨论一样，在上周的会议上，多位发言者强调了帮助缓解牧民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处理其争端的重要性，环境退化加剧了这些争端。显然，在乍得湖流域，建设抵御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复原力、加大社区介入力度从而支持国内和地方行为体改进跨界游牧管理的举措对于落实地区稳定战略的整体努力依然至关重要，需要得到持续支持。

乍得湖流域错综复杂的挑战影响了获取基本社会保护的不足，比如基本的健康与教育服务，特别是妇女和女孩获取这些服务不足。环境退化可妨碍女性的生计，加剧其脆弱性，COVID-19大流行病的影响现在导致这种情况更加复杂。妇女和女孩在该次区域面临危险的挑战，她们在非正规部门中的人数超多，受益于COVID-19恢复方案的可能性较小，这一点不应被低估。为此，重要的是要确保妇女平等获取教育、保健以及体面的工作，加强她们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保障她们充分、有效和切实参与应对大流行病的工作以及各种政治和决策进程。

在建和委介入的支持萨赫勒的大量工作中，受影响国家的代表强调，需要提供更多援助，以处理土地退化、降雨减少和多变以及健全的环境与发展政策资金不足等问题联合造成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使国家和区域有效管理自然资源、确保畜牧业具有复原力的工作更趋复杂。

在最近建和委关于太平洋岛屿的一次会议上，该地区的代表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干旱和风暴频率与强度增加、海洋酸化以及珊瑚礁和渔业由此遭到破坏发出警告，所有这些问题给民众的安全与生计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太平洋地区的多国政府请求国际社会提供额外支持，处理这些问题。此刻COVID-19大流行病的影响加剧了该地区易发生自然灾害的脆弱处境，包括供应链的中断消极影响粮食安全，因而这些请求变得刻不容缓。

正如进行之中的2020年建设和平架构审查和上周五发布的秘书长关于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报告（S/2020/773）所概述的那样，人道、发展以及建设和平行为体必须根据其各自职责与授权协调一致地努力，这一点我们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一点始终是真理，面对COVID-19的大流行则更为如此。

在乍得湖流域这样的地区,需要联合国会员国、国际、区域以及次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民间社会以及有关私营部门集体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充分落实非洲联盟-乍得湖流域委员会的战略,实现受“博科圣地”组织影响地区的稳定与恢复,增强其复原力。面对环境挑战和COVID-19大流行病,在我们寻求集体建设更强大、更有韧性的社会之际,建设和平和人道主义及发展努力得不到充足和可预测的持续资金将危及我们的努力。

现在是与各国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了,他们的生活和生计可能受到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挑战。我们必须支持在现有最佳科学基础上,在雄心勃勃的减缓和适应战略的指导下采取集体行动,并根据各国确定的发展优先事项,增强当地的抵御能力。

我们还必须铭记,促成和平或导致冲突的情况具有复杂性质,并且因局势而异。因此,需要对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量的独特特性树立符合各国和区域具体情况的深入认识。分析冲突根源是一项全面工作。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场武装冲突都有其具体的根本原因,在建设和保持和平方面,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

因此,建设和平委员会将继续改善其召集、沟通和咨询作用,坚持提供国际援助,支持国家建设和平优先事项。

附件31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西斯科·杜阿尔特·洛佩斯的发言

气候变化是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中不可否认的威胁，特别是在脆弱形势下。它对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以及全球社会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造成可怕的人道主义后果。它也是强迫移民、流离失所和粮食不安全的驱动因素。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和冲突的威胁，由此成为风险的倍增因素。认识到这一点，葡萄牙的《国防战略构想》确认，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是对全球安全的潜在威胁。该文件还强调，必须提高国家在预防、适应和快速应对气候威胁方面的能力。

在特定情况下，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可能导致冲突爆发，进而进一步加剧恶性循环，因为冲突阻碍了政府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造成的干扰作出适当应对的能力。

反过来，冲突可能是环境退化的驱动因素，再次助长恶性循环，这充分说明了今天讨论的这种相互关联的复杂性。葡萄牙主张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因为环境的性质是民用的，也主张根据国际法强烈谴责出于军事目的破坏环境。

乍得湖流域的局势发人深省，展现了环境退化与冲突的这种相互联系所带来的挑战有多么巨大。然而，它也是一个行动呼吁和给人希望的理由，表明国际社会决心走到一起，面对共同的挑战。增强国家和区域自主权至关重要，此外，这种自主权必须得到国家和区域当局坚定的政治意愿以及国际社会连贯、可预测和长期支持的补充。

当前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背景使得这些问题比以前更加紧迫。COVID-19的间接影响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会导致紧张事态增加，并可能加剧现有的冲突驱动因素，进一步削弱社会和经济复原力。为支持大流行病期间的预防和遏制措施而重新分配财政和人力资源，也可能影响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带来的挑战的能力。

因此，我们欢迎将安全和气候之间的关系纳入安全理事会的讨论。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根据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应密切关注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来自联合国气候安全机制等实体的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之间的相互联系。

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系统在涉及实地行动的问题上也可以发挥作用。目前部署的大多数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都位于受气候脆弱性影响特别大的国家。因此，必须考虑气候退化会以何种方式影响全面执行特派团的任务授权，即保护平民方面的任务。

我们预防冲突、保持和平、建设和平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努力将得益于对气候敏感而且因具体情况各异的方法。气候变化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但脆弱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弱势群体更能感受到它的影响。此外，实地的联合国机构、其它国际和区域组织、东道国政府和民间社会需要更好地进行协调，从而未雨绸缪应对气候风险并建设抵御能力。

最后，我要强调，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地许多人生计产生的影响的所有努力，必须与充分执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坚定承诺齐头并进。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对于促进和平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应

持续和坚定支持最需要帮助的国家,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如果我们不紧急对气候变化这一生存威胁作出集体应对,如果不果断减少碳排放,即使支持也是不够的。

附件32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大韩民国欢迎继续就气候与安全问题举行公开辩论,因为它们为讨论气候和环境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风险提供了机会。我们愿就这一重要议题强调以下三点。

首先,大韩民国认为,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是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我们正在全世界目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不利影响,其中许多影响空前之巨。仅今年一年,亚洲就遭受了最严重的季风洪水,北美正在抗击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欧洲正在遭受热浪和干旱;非洲则遭受了巨大蝗灾。

所有这些都将产生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包括被迫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和公共卫生问题,这些只是其中几个例子,这些问题正在日益升级,导致区域不稳定。

第二,大韩民国认为,我们需要联合国以全系统办法应对气候和环境相关安全风险,我们需要更切实的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继续参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议程,建立气候安全机制及其举措。我们也支持秘书长就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及时和全面的报告。

关于具体行动,我们愿重申,我们认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最近通过的关于对萨赫勒地区的国际支持的第2020/02号决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决议规定,联合国有关机构和会员国应更密切地合作,从而采取更切实的行动。大韩民国将继续在该决议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和平森林倡议是2019年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上发起的,通过在脆弱和冲突地区合作修复和恢复退化的土地和森林来促进和平与信任,提供了这方面的另一个良好范例。

第三,我们认为,从冠状病毒病(COVID-19)恢复的计划必须把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必要考虑放在核心位置。疫情对各国社会和经济造成空前规模的损害,但我们的恢复努力不应使我们回到过去。相反,为了帮助从COVID-19的破坏中恢复并重建得更好,我们需要一个绿色恢复计划。

在这方面,韩国政府最近启动了“韩国绿色新政”,通过投资于绿色部门和创造绿色新工作岗位来发展低碳和可持续经济。这最终会使韩国经济符合《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认为这两份文书对于减少全球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至关重要。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正在日益成为导致区域不稳定的因素并威胁全球和平,并且我们无法单独应对它们。事实上,人类和地球都容易受到这些全球威胁的影响,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采取应对行动。大韩民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防止气候和环境危机进一步升级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附件33

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法文]

我谨赞扬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尼日尔选择举行本次关于环境退化的人道主义影响与和平与安全之间联系的重要公开辩论会。我也要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易卜拉欣·提亚乌先生以及后面的其他发言者,感谢他们所作的高质量发言。

环境退化造成的安全风险是一个重大问题,安全理事会十多年来一直重点关注这一问题是正确的。

尽管安理会和本组织其他相关机构随后采取了很多举措,但今天这些安全风险更加严重,因为近年来自然灾害达到了令人特别震惊的程度,给地球上很大一部分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和人道主义影响。

以下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根据哥白尼数据,森林大火30年来首次在加利福尼亚肆虐约8000平方公里,在1月1日至8月31日间产生了2.44亿吨二氧化碳,相比之下2019年全年北极圈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81亿吨。

与此同时,空前规模的洪水正在全球许多地区造成巨大破坏,尤其是在萨赫勒地区。仅在苏丹,洪水就损坏了10多万所房屋,导致50多万人流离失所,并将尼罗河水位抬高到了17.57米——根据苏丹灌溉和水资源部的数据,这是10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

此外,自2015年以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一直在发出警报说,每年因侵蚀、盐碱化、酸化和土壤污染而损失数千公顷可耕地,并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影响。

根据粮农组织蝗虫观察9月份发布的最新情况,萨赫勒地区沙漠蝗虫的持续入侵加剧了这种令人担忧的现象。除这些昆虫造成的潜在危害之外,还必须加上已经入侵塞内加尔河谷的食谷鸟造成的损害。

自然灾害造成相当大的生计损失,加剧对日益稀缺的可耕地、牧场和水资源的争夺和紧张关系。它们还会增加移民,造成更多健康问题,并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因此,它们是冲突中的根源或者不断恶化和反复出现的因素。

因此,自然灾害造成的和平与安全风险绝不是遥远未来的场景。对全世界数百万人来说,它们已经成为现实,萨赫勒地区、乍得湖流域和中东的例子充分表明了这种联系,这些地区正在拼命应对多方面危机。

事实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在过去60年中,至少40%的国内冲突与木材、钻石、黄金和石油等珍贵自然资源直接或间接相关,或者与有时稀缺的资源,如肥沃的土地和水资源有关。

此外,10个最大的和平行动中,有8个部署在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萨赫勒和中东地区国家,这并不奇怪。根据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7月17日的报告,受冠状病毒病造成的粮食危机威胁最大的27个国家中,大多数是紧张局势的温床,已经在与极端天气条件作斗争,这也并非巧合。

这些结论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即环境保护,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必须充分纳入冲突预防战略,并且因此必须放在安全理事会议程的首位。

此外，为预防冲突而保护环境的战略应与在武装冲突期间打击环境资源非法开采活动的行动相结合，某些武装叛乱和恐怖团体通过非法开采获得活动资金。在这方面，必须改善冲突期间对自然资源的监测和保护，并建立国际贸易制裁制度。

然而，要使这种办法有效，首先必须确保和平和停火协议的签署方在协议中明确承诺在开采自然资源时确保透明度和公平性并保护所有权，并确立公平分配自然资源收入的原则。

同样，在某些维和特派团，如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和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的任务授权中纳入有关东道国支持自然资源管理的规定，虽然值得欢迎，但应成为主流并得到显著加强，包括通过充足的资金和后勤资源以及任命环境顾问来实现这一目标。

此外，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制定全面一致的办法，不仅要使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与在相关国际文书——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框架下已经开展的工作相一致，也要考虑到各种区域和国家行动。

在这方面，还应考虑建立一个分析和预警工具，以便把联合国、区域组织和各国以及各种其他伙伴提供的关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退化对和平与安全所造成影响的数据集中起来。秘书长甚至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工具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对情况作出评估并就这一问题提出有益的建议。

最后，解决今天促使我们走到一起的问题方面的第一要务是确保环境特别是气候健康。为此，气候融资必须充分运作，尤其是在适应方面，因为这是维持和保持应对气候变化活动的有效手段，因此也是预防冲突的有效手段。塞内加尔再次呼吁发达国家履行支持气候融资的承诺，在2020年后为绿色气候基金充资，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进而建设其复原力。

附件34

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米哈尔·姆利纳日的发言

斯洛伐克赞扬尼日尔倡议召开一次关于环境退化的人道主义影响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公开辩论会。

我国代表团赞同以欧洲联盟名义提交的发言(附件21)。

世界各地的冲突正在增多,变得更加持久和分散,致使数量空前的民众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环境退化等因素为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变得越来越明显。它给子孙后代带来生存风险,并对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真正的影响。气候变化具有倍增效应,会引发其他问题,其后果影响从生态系统稳定到粮食生产和人类冲突等各个方面。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损失;森林砍伐;水、空气和土壤污染;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以及人口压力和城市化,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人道主义后果。

斯洛伐克确认,环境退化的影响增加了人道主义危机、流离失所和冲突的风险,并对最弱势民众产生了严重影响。把环境纳入人道主义行动对于确保人道主义行动有效、可持续和可问责至关重要。

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主席编写的摘要确认,单靠人道主义援助永远无法充分满足或可持续地减少世界最弱势民众的需求;相反,需要采取新的始终一贯的办法,立足于消除冲突根源、加强旨在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政治外交以及把人道主义努力、发展努力和建设和平努力结合起来。

人道主义-发展-和平统筹办法着眼于消除造成民众流离失所的灾害根源,并尽量减少其影响。我们有一系列重要工具可用。我们需要继续优先保护环境和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以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将自身潜力用于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战略。

联合国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联合环境股,在环境和紧急情况交界领域开展工作,与人道主义行为体和环境行为体密切联系,以加强人道主义反应的可持续性。

人造成危机的方式和危机影响人及其生活的自然环境的方式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现在需要采取行动来预防和缓解可预见的人道主义危机,特别是避免会导致人们被迫迁徙的环境破坏。我们必须继续设法在人道主义行动中积极主动地处理环境问题,寻求必要的全球政策反应,并制定新的办法,以便做更好的准备。斯洛伐克致力于倡导在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支持遵守国际人道法,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满足平民的保护需求。

附件35

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古斯丁·桑托斯·马拉韦尔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我赞同欧洲联盟代表团的发言(附件21)。

我谨祝贺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尼日尔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继续从全球和三方面角度评估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我也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易卜拉欣·蒂奥以及土地大使兼环境活动人士因娜·莫贾女士所作的发言。

首先,我谨回顾秘书长的停火呼吁并支持第2532(2020)号决议,因为它们与当前的问题相关。

我们不能继续谈论所谓的人道主义事务、发展、和平与安全三方面共生关系而不明确纳入气候和环境问题。

冠状病毒病要求作出在所有阶段都考虑到环境问题的全球反应,原因有二:第一,因为任何解决办法要想有效,都必须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和环境情况;第二,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会加剧人们的脆弱处境,并在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和打破脆弱与贫困循环方面增添不平等因素。

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加强人道主义行动、保护平民和发展方面的文书,以便它们为建设尊重人权的坚韧和包容的社会作出贡献。

我们只有更经常地把环境问题及其影响列入安理会议程,才有可能实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目标。为此,必须收集相关数据并认真分析气候因素和条件,以便进行预防和及早采取行动,以及减少影响。在二十一世纪,气候是建设和平政策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西班牙完全赞同尼日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保护环境意味着保护生计,例如农业和畜牧业。在处境脆弱的国家,这是必不可少的。保护环境还意味着保护平民。

气候变化威胁到千百万人的生活,威胁到粮食安全和清洁水供应,威胁到健康和多样性,威胁到稳定、和平与安全。

因此,西班牙制订了一项指南,把环境纳入我国人道主义行动的主流,该指南将于数周后正式出台。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为实现拯救生命并有效应对最脆弱民众需求的目标做出贡献的唯一方式。

西班牙的另一个优先事项是捍卫并遵守在武装冲突局势下保护环境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因此,我重申,冲突各方有义务随时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最后,我回顾,为了以可能的最佳方式应对我们面临的危机,安全理事会必须在其受命的报告、通过的决定、核准的授权、制定的措施以及策划的有效对策中顾及环境和气候变化。

附件36

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 英文和法文]

瑞士感谢尼日尔举行本次重要的辩论会。

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对民众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当它与原有的冲突动因叠加时。瑞士欢迎把这些话题摆上安全理事会的议程,无论是通过关于乍得湖流域的第2349 (2017)号决议,还是7月份关于气候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见S/2020/751)。我们欣见,有关气候方面安全风险的措词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安理会的成果,并强调安理会议程上的多种局势需要更好地评估这些风险。瑞士愿强调以下三点意见。

首先,环境退化既有可能是冲突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其动因。在健康、水以及粮食保障方面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是平民,特别是最脆弱者—儿童、残疾人以及流离失所者。妇女常常首当其冲遭受这些恶劣影响。自然灾害和自然资源枯竭可破坏生计,导致流离失所,并恶化而形成冲突。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更多地关注环境退化、气候变化、流离失所、社会政治风险以及冲突之间的互动。

其次,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造成破坏性的人道主义影响,必须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各会员国和联合国实体必须加强对话和协调。秘书处的气候安全机制发挥着为安全理事会和系统中其它机关提供气候风险评估的重要作用。建设和平委员会也可在这些问题上发挥支持安理会的重要作用。预警系统在尖端技术的帮助下,对于制订充分对策、包括在联合国特派团的相关任务授权中顾及气候方面的风险至关重要。

第三,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环境的各个不同方面。例如,饮用水供给是民众生存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保护环境还有助于保护平民。瑞士呼吁各会员国和武装冲突各方充分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从而保护环境,减轻这些冲突的人道主义影响。我们还鼓励适当考虑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原则草案。

环境退化和气候方面的安全风险可给和平与安全造成恶劣影响,并且增加未来发生大流行病的风险。我们必须改进整个联合国系统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协调,以确保连贯协调地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要在这些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附件3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感谢尼日尔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推动安全理事会思考安全与联合国议程上其它关键项目如环境挑战之间的关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为，环境退化是涵盖气候变化的一个总括概念。正如我们在7月份的公开辩论会（见S/2020/751，附件50）上所表述的那样，这是一个放大冲突和暴力的因素。环境退化—从污染到毁林到表层土流失—可带来流离失所、生计被毁、争抢资源、仇恨和不满其它团体、极端分子招募以及其它影响。反之，环境养护和气候行动则可以产生相反的影响，带来明显的安全裨益。

同时，环境退化可成为冲突和暴力—有时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蓄意所为—的产物。达伊沙确实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使用焦土战术，已被铭刻在我们许多人的记忆之中。最近，安理会看到，也门的胡塞武装利用FSO SAFER油轮大量漏油的威胁作为政治和安全上要价的砝码，违反安理会的指示，阻挡联合国技术团队登船。因此，安全理事会审议环境问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在此背景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愿提出四点建议，以改进安理会在环境退化问题上的行动。

首先，我们认为，更加详细和标准化地分析环境退化对安理会议程上各种局势的安全影响将有利于安理会。维持和平和政治特派团的工作人员可接受培训，以评估环境和气候对安全的威胁，并提请注意那些具有生态重要性的地区和脆弱地区。现有的联合国驻境内工作人员，比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人道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可为这些工作贡献自己的分析能力。依据这些信息，安理会成员可采取行动，以防止安全与环境关联产生的关切，或者处理这些关切。

其次，我们看到，通过在安理会承诺—早在第1625（2005）号决议—中设下的先例，包括通过协助安理会支持的特派团，对非法开采和贩运自然资源可推动武装冲突爆发、升级或者继续的情况采取行动。不加管制的采矿、伐木以及偷猎引发冲突和环境退化，形成恶性循环。为此，在操作层面，安理会应继续把非法开采自然资源作为制裁制度中的一条指认标准，进而在专家组的职权范围中纳入适当的专长。此外，在必要情况下，安理会应继续像它在关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的第2463（2019）号决议中所做的那样，赋予特派团权能，寻求政治解决，以制止冲突资源跨界流动，并为资源管理提供技术和政治支持。我们认为，这些任务授权可有助于减少环境退化。

第三，安理会可确保外地特派团不损害环境，并遵守《联合国环境行动计划》。例如，特派团可具体审视对地下水和土地覆盖的影响。特派团还可考虑用可再生能源替代柴油发电机，此举有大幅节约成本的潜力。此外，对绿色基础设施和做法进行投入可给当地社区带来部署后的裨益。

最后，我们必须调动联合国和国际系统其他部门的环境领域专门知识，与安全对策同时发挥作用。在人道主义和稳定小组中适当配备环境专家，找出并开始解决环境问题，从而降低不安全状况恶化的风险，是切实可行的。联合国环境大会最近通过了关于冲突的决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定期进行冲突后

评估。这些都是整体办法的积极例子, 会员国可以通过其在治理机构中的作用鼓励这些办法。

在冲突局势中, 环境退化不完全属于联合国机构的任务范围。会员国有责任推动和激励我们的机构为取得集体成果而共同努力。安全与环境的关系也不例外,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期待与安理会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接触, 确保我们一致开展工作、调动资源, 产生更大影响。

附件38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乌克兰高度赞赏尼日尔倡议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并感谢所有通报人介绍情况。

乌克兰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抵御俄罗斯武装侵略，非常清楚武装冲突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远远超越敌对行动的激烈阶段或地理范围。

受冲突影响的顿巴斯领土面临的最危险的环境威胁包括：矿井被淹、该地区的主要供水渠道有可能发生故障、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有毒氯化物的排放、化学和放射性环境污染、物理和化学性质变化以及居民区和重要基础设施地基塌陷。顿巴斯地区80%以上被破坏工业企业和关键公共基础设施的环境风险属于危险类或非常危险类。

由于停电、基础设施被毁、抽水设备失灵等原因，该地区已有39个矿井被淹。矿井被淹可能会导致酸化，并使重金属转移至当地地下水和沿岸环境中，可能会对人类健康和野生动物产生重大影响。一些被淹的矿井早先被用作废物储存设施。

尤其令人关切的是，1979年在被占领的叶纳基耶沃市附近的Yunkom煤矿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场址面临被淹的危险。这构成放射性污染扩散到地下水、河流并最终进入亚速海的真实风险。

森林火灾和非法砍伐树木对冲突地区的环境和当地人口构成另一个严重威胁。根据日内瓦环境与安全科学政策平台两年前进行的一项评估，受冲突影响、破坏或摧毁的生态系统覆盖面积至少为53万公顷，其中包括18个自然保护区，覆盖面积为8万公顷。自那时以来，情况进一步恶化，仅在7月份，卢甘斯克地区的森林火灾就摧毁了1500多公顷生态系统。

我们还看到，由于自然和农业地区环境管理不善，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出现了严重环境退化的迹象。

还须强调，乌克兰因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及其周边地区的非法活动而遭受的环境危害所涉国际法原则不限于国际人道法。例如，其中还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非法建造横跨刻赤海峡的桥梁只是这种违法行为的一个例子。除了侵犯乌克兰作为沿海国的权利和破坏国际航行自由之外，未经授权建造桥梁可能会对亚速海和黑海的沿海和海洋环境造成长期后果，干扰水循环，加剧侵蚀并破坏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保护区。

现有的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框架的弱点，是乌克兰在2016年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二届会议上倡议关于“受武装冲突影响地区的环境保护”的决议的原因之一。在2017年环境大会第三届会议上，我们还联署了伊拉克关于“减轻和控制受武装冲突或恐怖主义影响地区污染”的决议。

乌克兰被占领土的危险环境状况十分严峻，可能会导致真正的灾难，特别是在缺乏可信环境监测系统的背景下。这不仅影响到乌克兰全国领土，也影响到我们的邻国和其他临近国家。

最后，我们相信，俄罗斯武装侵略的环境影响必须成为联合国及其机构的关注焦点，以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人民遭受苦难。